

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 重要谈话精神

——学习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辅导材料

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
北京市委《学习与研究》杂志社

组织编写

主编 沈宝祥

中国经济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

责任编辑:栾建民

封面设计:姜宝玲

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
——学习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辅导材料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北街3号)

(邮政编码:10003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四二二九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6印张 135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6,000

ISBN 7-5017-1861-X/D·161

定价:3.55元

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

——学习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
重要讲话辅导材料

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
北京市委《学习与研究》杂志

组织编写

主编 沈宝祥

中国经济出版社

目 录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召开全体会议讨论我国

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 (5)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

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

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

..... (7)

序言 沈宝祥 (14)

一、一个鲜明的中心思想 周锡荣 (24)

二、实事求是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精髓 金守庚 (31)

三、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已经走上

正确的发展道路 周锡荣 (38)

四、我国国民经济必须有一个积极发展的

速度 张素峰 (47)

五、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我们加快改革开放

步伐，加快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徐焕章 (57)

六、加快发展经济必须更新观念 李庆华 (62)

七、发展经济“要走给下面放松的路，不要

走给下面卡紧的路” 李世华 (71)

八、改革也是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 刘奎波 （80）

九、要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

的关系…………… 陈富强 （89）

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和我们

要建立的新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 夏爱平 （97）

十一、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殷 真 （104）

十二、市场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 陈高桐 （115）

十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计划与市场

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发展过程…………… 刘 鹏 （124）

十四、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董新民 （133）

十五、坚持“两手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梁丽萍 （142）

十六、解放思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精神…………… 沈宝祥 （150）

十七、“左”和右的主要表现及其思想认识根源……………

…………… 沈宝祥 （158）

十八、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大力推进

党的建设…………… 刘荣荣 （168）

十九、在新形势下干部要加强学习…………… 王兆铮 （176）

二十、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

的要求…………… 王兆铮 （185）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召开全体会议

讨论我国改革和发展的 若干重大问题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9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认真讨论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会议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会议认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为此，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带领亿万人民在实践中得出的最为宝贵的经验，是社会主义中国这十几年间发生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牢牢把握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中国就大有希望。

会议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勇于创新，敢于试验。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我们不仅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而且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判断姓“社”姓“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

生活水平。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

会议指出,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努力发展自己,特别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是一个关键时期。我们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真抓实干,讲求效益,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会议指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和建设步伐,关键在于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当前,要特别注意抓住改革和建设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思想和政策主张,并认真组织实施。会议就此作了研究和部署。各级领导要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腾出主要精力多办实事。

会议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坚持两手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会议号召,全党同志要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奋发进取,艰苦奋斗,以改革和建设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四大的胜利召开。

(原载《人民日报》1992年3月12日)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

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 重要谈话精神，集中精力把经济 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

阐述了九个问题：关于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关于改革也是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关于积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东西；关于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关于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关于贯彻落实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的要求。

新华社北京 6 月 14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强调指出，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最近的重要谈话精神，进一步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成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江泽民是 6 月 9 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这一任务的。当天的会议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兼中央党校校长乔石同志主持，出席会议的领导同志还有丁关根、温家宝和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薛驹等。

江泽民说，小平同志重要谈话贯穿了一个鲜明的中心思想，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对于这个中心思想，我们在认识上和工作中，一定要牢牢地把握住。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

江泽民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不仅要努力学习和掌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的一系列战略思想、理论观点和决策原则，而且要努力学习他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便改进领导工作，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

江泽民强调指出，邓小平同志提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引导我国的现代化事业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他为我们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建立的新的历史功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国际风云变幻中能够经得起严峻考验，立于不败之地的最重要的原因。完全可以这样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及其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形成，标志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实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的飞跃。

在讲到如何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时，江泽民阐述了九个问题：关于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关于改革也是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关于积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东西；关于加快经济

体制改革；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关于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关于贯彻落实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的要求。

江泽民在谈到加快经济建设的发展时说，国民经济必须有一个积极发展的速度。慢了不行，停顿不前更不行。否则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前，我们要注意把握和做到这样几条。第一，抓紧有利时机，积极创造条件，力争以更快更好的速度前进，切不可过于求稳而丧失时机，迈不开发展的步子。第二，全国各地的情况和条件千差万别，在发展速度上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不作统一的规定。凡是有条件能搞得快一些的就搞快一些，只要是质量高、效益好、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速度，就应放胆去做。第三，要更新观念。不要一讲加快发展，就走到过去那种片面追求产值、指标和片面扩大基建规模的老路上去，新上一些必需的基建项目是完全应该的，但主要应向深化改革、推动技术进步、增加高质量的新产品、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提高企业素质等方面，去争速度要效益，这样实现的发展速度，就会是又快又好的速度，不会有大的风险。第四，中央经济主管部门要深入下去，帮助地方和企业进行分析和研究，找到搞好企业的路子，并为它们加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切实搞好服务，改进宏观管理。总起来说，就是小平同志所要求的，要走给下面放松的路，不要走给下面卡紧的路。

在谈到改革也是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时，江泽民指出，我们过去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这种经济体制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存在忽视甚至排斥商品经济、忽视甚至排斥市场作用的弊端等等，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生产发展的要求，束缚生产力的发

展,以致往往把整个经济搞死,使其失去生机与活力。所以,对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改革原有的经济体制,是为了清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使生产力进一步得到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是一次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在谈到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时,江泽民强调,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进一步重视。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应该包括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在谈到经济体制改革时,江泽民指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而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这是正常的,说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特别是对一些重要问题,总是要经过反复认识、反复讨论,并通过实践不断总结提高,才能得到比较科学的认识。现在可以这样讲,经过十多年的摸索和总结国内外经验,我们对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认识,已经比较成熟了,在全党也进一步统一了,完全可以进入加快实施的阶段了。

江泽民指出,要加快新经济体制的建立,当前必须抓紧解决几个关键性问题。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二是抓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三是更新计划观念,转变计划管理职能和方式;四是大力培育市场,建立统一的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

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江泽民说,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

改革,是对存在弊端的原有体制的革命,目的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增强生机与活力。我们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走西方民主政治的道路。它所遵循的方向和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我们将继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继续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时,我们将通过实现干部队伍“四化”等措施,增强党政机关和领导班子的活力;通过机构改革、精兵简政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提高决策效率和办事效率;通过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权力下放等措施,充分调动各行各业和基层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江泽民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他说,这应该成为我们领导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和领导方法、领导艺术。为什么必须坚持“两手抓”呢?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把大门打开了,国外一些好的东西进来了,但也会带进来一些消极腐朽的东西,影响以至毒害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实行“两手抓”,就可以有效地防止和减少各种丑恶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项事业,是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的事业,不但经济建设要上去,人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秩序、社会风气都要搞好,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整个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实行“两手抓”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在谈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时,江泽民说,解放思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精神。思想不解放,脑筋不换,一切工作都很难推动。思想解放了,脑筋活了,想问题的面就宽了,无论是发现和选拔人才,无论是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和障碍,无论是开拓新的领域和新的事业,办法就会更多,路子就会

更广阔。所以可以说,解放思想是一个法宝,是一个帮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永远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必须伴随建设和改革长期坚持下去。所谓解放思想,就是勇于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善于从实际出发,努力开拓进取。

江泽民指出,在防止和反对错误倾向的问题上,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现实生活表明,“左”的表现主要是停留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改革开放前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和政策上,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因此不容易接受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甚至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认为搞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仍用过去那种“阶段斗争为纲”的思想来影响以至冲击经济建设为中心。右的表现主要是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企图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无论是“左”还是右,都会给党造成巨大危害,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江泽民说,为什么小平同志讲到警惕右时,特别指出主要是防止“左”呢?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左”的错误泛滥的时间很长,影响很深。在建设和改革中要开辟新的道路,要改变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原有模式和做法时,阻力常常主要是来自“左”的方面。由于“左”的东西往往带着一些革命色彩,容易给人们以迷惑作用,这就更需要提醒我们的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防止“左”的干扰。

江泽民还指出,“左”和右都是片面性,它们产生的根源都是主观唯心主义。为了警惕右和主要防止“左”,在党内首先是在领导干部中,要提倡通过加强学习,提高对右特别是“左”的危害性

的认识,提倡自觉地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总结经验,从而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更加紧密团结全党同志,齐心协力地不断开创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江泽民说,要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关键是要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努力提高全党战斗力。现在历史条件变了,社会环境变了,党肩负的任务变了,因此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方式、方法等等,也要相应地加以改变或改进。过去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应结合新的实际继续运用和发展,但光靠老经验老办法是不够的,必须有新的创造。这就要求我们根据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努力,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大力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

最后,江泽民强调,贯彻落实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和组织实施中央的各项工作部署,一定要同本地的实际结合起来,并使之具体化。要真抓实干,少说空话,多办实事,鼓实劲,出实效。

(原载《人民日报》1992年6月15日)

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序 言)

—

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到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同志(有中央党校的教授和各部门负责人参加)发表了重要讲话。

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最近的重要谈话精神,进一步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成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围绕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阐述了九个重要问题。他在这个讲话中,精辟地概括了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中心思想,阐释了邓小平同志谈话中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在全面分析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展情况的基础上,回答了大家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对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谈话精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江泽民同志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时候,发表这个重要讲话,对大家加深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推进改革开放和各条战线的工

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即将召开的时候发表这个重要讲话,对十四大的具体准备,对十四大的议题,必然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对讲话谈到的九个问题一个一个地加以领会,吃透精神。

二

为了更深入地学习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掌握其精神实质,要结合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著作和党的重要文献,特别是要很好地理解和掌握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下面,试对这个基本思路作些阐述。

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①这是我们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的两个重大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围绕这两个重大课题,总结历史经验,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邓小平同志多次阐明,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指出,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邓小平同志认为,过去耽误太多,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在视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3页。

察南方时，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要大大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实行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同志说：“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他提出，“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①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实质。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②

主要矛盾决定我们的中心任务。要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就要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③后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规范的语言表述了我国的主要矛盾，这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多次重申了这个主要矛盾。

实行工作重心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明确衡量我们工作的根本标准。邓小平同志提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13页。

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4页。

③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8页。

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④ 党的十三大坚持了这个精神。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生产力标准”，指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又具体讲了三条标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否则，政治就变成了空头政治。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就要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研究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状况，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并把它称之为“政治目标”。党的十三大确定，我国经济建设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在 80 年代，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实现小康目标，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

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同志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他提出，要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并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1988 年，他根据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把发展科技和教育摆在发展战略的第一位。在南巡谈话中他又提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④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 181 页。

怎样才能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呢?

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以后,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说,实现这样一个目标,也不是很容易的。讲大话,讲空话,都不行,要有一系列对内对外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才能实现。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再加上我们自己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这样,就使我国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①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由之路。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又作出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② 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改革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也是一场伟大的试验,既要勇于探索,又要细心谨慎。我们的原则应当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

为了发展生产力,还必须实行对外开放。中国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

①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第33页。

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21页。

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引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对外开放就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所有类型的国家开放。在对外开放中，要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①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针对认为改革开放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古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同志多次阐明，改革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而是长期的政策。翻两番，需要 20 年时间，实现“三步走”的战略，要到下世纪中叶。加起来，要 70 年。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要改变，只能变得更加开放。

在决定实行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以后，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允许的。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又一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54 页。

次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邓小平同志又指出,四项基本原则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他还指出,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更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

邓小平同志认为,两个基本点概括得很好。他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① 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在南巡谈话中,更明确地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要求。邓小平同志阐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

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我们党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科学概念。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② 在视察南方时,他又指出,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两个文明一起抓,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方

①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第42—43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6页。

针。一定要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我们要解决祖国统一的历史任务。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并指出，这是重要的中国特色。

我们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国内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在国际上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就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要根据当前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党承担的任务的要求，大力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提高全党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在改革开放中，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结晶，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其精髓也是实事求是。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基本思路）相对照，其差别是很明显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根本点上，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在经济基础领域，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在上层建筑领域，我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对什么是

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存在不少不科学不切实际的理解。这种对社会主义的不科学不切实际的理解,突出地反映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没有把握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是片面强调了阶级斗争。那时认为,在社会主义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同邓小平同志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有着重大的差别。

(二)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判断脱离了实际。过去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现在,我们明确肯定,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决定中心任务。如果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那么搞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就是抓阶级斗争。如果主要矛盾是生产力落后,那么,搞社会主义首先要集中力量抓发展生产力。

(三)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违背了社会主义的要求。过去,认为搞社会主义应当以阶级斗争为纲。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当然,也要发展生产,但应当是“抓革命,促生产”。现在,我们明确,建设社会主义,应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

以上三点,一个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还有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可以说是一种基本思路。这个基本思路就是“左”的思想的几个要点。因此,理解和掌

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并与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不科学的不切实际的理解相对照,将能更好地从总体上排除“左”的影响,增强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提高领导水平。

1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雄辩地证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经得起社会实践的检验和历史风波考验的,因而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且,这个理论必将随着实践的前进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长远的指导作用,是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内容很多,作为领导干部,很需要明确其基本思路。1977年,邓小平同志曾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这是有特定针对性的,但其精神具有普遍意义。今天,学习和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对于我们的领导干部全面理解、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将是大有裨益的。

(沈宝祥)

一 一个鲜明的中心思想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深思熟虑，高瞻远瞩，既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又总结了10多年来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内容十分丰富。他认为，这些谈话贯穿了一个鲜明的中心思想，这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这个中心思想，大致上可以归纳成四个方面。

（一）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不仅提出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而且反复强调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次南巡重要谈话，又一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

一是“坚定不移”。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认为，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说：这一点，我讲过几次。

为什么我们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要“坚定不移”呢？原因有两个。第一，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强国富民的生命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舍此，我们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吸引力，我们的国家在国际上也就没有地位。第二，实践已经证明，这条基本路线已经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的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坚定不移地贯彻这条路线，中国就大有希望。所以，邓小平同志说，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二是“全面贯彻”。在谈到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时，邓小平同志总是强调防止片面性，尤其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全面贯彻执行。他一方面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强调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另一方面他也始终坚持“两个基本点”，既主张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又认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此外，邓小平同志谈到其他重要问题时，也都是以党的基本路线来统帅的。比如，在讲到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时，他就明确说：“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邓小平同志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左”和右等问题的精辟见解，以及坚持“两手抓”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也无不体现了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思想。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早在党的十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提出来了。他认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以及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可见，邓小平同志是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前提条件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像一根红线贯穿在这次南巡谈话之中。邓小平同志不仅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且率先垂范给我们作出了榜样。他针对某些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思想僵化，一针见血地指出：“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接着提出判断改革开放成败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给了人们一个准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可以大胆地解放思想。在对待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敢于突破不符合社会主义实际的传统观念，明确地认定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并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给了人们捅开僵化思想的一把钥匙，破除那种“缩手缩脚”、“前怕狼、后怕虎”的精神状态，大胆地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思想解放了，脑筋活了，想问题的面就宽了，无论是发现和选拔人才，无论是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和障碍，无论是开拓新的领域和新的事业，办法就会更多，路子就会更广阔。”

有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地试验，这是联系在一起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一致的，正如江泽民同志讲话所指出：“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勇于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善于从实际出发，努力去开拓进取。”解放思想决不是胡思乱想，而是要放开手脚大胆地试验。邓小平同志说得十分形象：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好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搞错了就纠正、就停止。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对我们加快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三）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一要排除各种干扰，二要抓住有利时机。这也是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反复强调的。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的东西，我们当然要警惕。1989年的动乱，就是右的。我们坚决果断地平息动乱和暴乱，就是我们警惕右、反击右的最好说明。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我们当然要提高警惕，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同志在谈话中告诫我们：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是非常及时、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更要注意防止“左”，因为“左”的东西带有革命的色彩，具有某种迷惑性和欺骗性。现在，有些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

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这些就是“左”。邓小平同志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因此,排除各种干扰,就是要排除这些“左”的或右的干扰,不排除这些干扰,改革开放就无法顺利地进行。

当然,我们一方面要排除各种干扰,另一方面也要抓住有利时机。当前,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十分有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就国内来说:第一,10多年来,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取得了巨大成就,大大增强了我们的综合国力,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第二,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平息以后,经过大量的工作,重新实现和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团结;第三,党的基本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改革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广大干部和群众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第四,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巩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第五,邓小平同志的南巡重要谈话,进一步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就国际来说:第一,世界正处于新旧格局的交替过程中,虽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是世界出现多极化的格局,我们仍然可以争取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第二,东欧、苏联剧变以后,西方帝国主义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矛盾错综复杂,我们可以灵活利用的回旋余地还是比较大的;第三,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进程正在加快,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进行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重组和升级,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出现良好势头,这些都为我们扩大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总之,我

们要抓住有利时机，充分利用这些国内和国际的有利条件，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搞上去。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提醒我们的：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这个提醒，对我们特别是对于各级领导是十分重要的。

(四)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这是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最核心的内容，也是他最殷切的期望。为此，他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又是十分重要的意见。

首先，他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分“三步走”的宏伟设想。现在，第一步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是关键的一步；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很有气魄的战略设想，既不是急于求成，也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符合我国实际、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邓小平同志在这次南巡谈话中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20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

其次，他提出和逐步完善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标志着我们党已经找到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集中地体现在我们党的基本路线之

中。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一条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能够保证我们的经济建设欣欣向荣地发展。实践也已经证明，10多年来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各种重要的理论观点和实际决策，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具体实际的结合和统一，经得起社会实践的检验和形势发展的考验，因而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他最近的谈话，也是他10多年来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贯思想的高度体现和新的发展。

其三，他提出我们的经济发展，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他指出，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他同时又指出，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为此，他要求广东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要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要求上海也可以搞得更快一点。邓小平同志还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认为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

最后，邓小平同志认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他除了提出著名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外，还主张用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使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他号召我们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

综上所述，这四个方面就是贯穿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一个中心思想。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正如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所强调的：“对于这个中心思想，我们在认识上和工作中，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周锡荣）

二 实事求是是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实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的飞跃。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进一步阐述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实事求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们只有把握住这个精髓，才能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精神。

（一）实事求是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在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根据新的情况认识、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到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20年中，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在迅猛发展，而我国的经济虽然取得不少成就，但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局面，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之后更处于崩溃的边缘。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严重的“左”的失误。为了恢复和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必须进行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但是，进行这项工作，首先碰到的是如何看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由于“左”的错误和个人崇拜的长期影响，有的领导人以为要继承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见和重要决定，尽管这些重要意见和重要决定是错误的。于是，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凡是”，

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观点是典型的教条主义，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必然导致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能前进，更不可能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因此，邓小平同志自1977年以来多次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反复强调要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并支持和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为了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强调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抓住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这个精髓和根本，不但解决了既要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样似乎是两难的问题，而且为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辟了道路。

其次，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从思想路线上总结搞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经验。他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20年的历史教训告诉了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①他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时，总是把经验归结为根本的一点，即实事求是。他在1984年10月指出：“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7页。

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① 1987年1月他又说：“八年来的成功，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制定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立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②

总之，“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③ 邓小平同志的概括有力地说明，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

(二)实事求是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灵魂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由若干基本观点构成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体系。其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也就是说，这一理论的所有基本观点和原则，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实事求是为其内在灵魂。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就是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因此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体现了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精神。它正确处理了发展生产力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反映了中国急需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国情。

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也是一场新的革命。邓小平同志这一崭新的基本观点，是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2页。

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59页。

③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页。

的实际提出来的，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客观要求。

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实行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情况的反映，以及国内外经验教训的概括体现。

关于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关于共同富裕和允许一部分地方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两手抓”、“一国两制”等一系列观点，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和必由之路，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

根据邓小平同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定的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实践证明这条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今后也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

按照认识的发展规律，实事求是也是一个过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也有一个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因此，只有始终抓住实事求是这一总的要求和活的灵魂，我们的理论才会不断完善和保持生命力。例如，我们对计划和市场的性质和作用就有一个认识逐步提高的过程。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发展和平衡、稳定、协调的关系，科学技术的作用以及党的领导方法、党的建设等问题的认识也是如此。因此，为了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必须按照实事求是的要求不断解放思想，进行新的探索。

邓小平同志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珍贵的、有力的武器。但是，任何理论，包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如果只是空谈一阵，束之高阁，不与各地、各部门的工作实际相联系，如果只知重复背诵，不加以贯彻、落实，都是不符合这一理论的精

神的，都是没有用的。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灵魂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此，贯彻、落实这一理论也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只能反映一般的和大致的情况，要把它运用于各地、各部门的实际工作中，就必须从本地、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出发，使之具体化。

例如，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上，总体要加快，但各地情况不一，不能一律要求，而应结合本地实际加以落实。而且经济发展的速度要以质量、效益、外向型经济为前提，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要以环境、配套措施、群众承受能力为前提。看不见有利的时机和条件，不敢加快速度，是脱离实际；不顾客观条件制约一轰而上，也是脱离实际。而一切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都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招致工作的损失。

再如，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存在市场，计划和市场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而是调节经济的手段，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飞跃。但是，计划和市场范围和形式随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将二者很好地结合并加以调整、改变，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和具体化。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反对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的“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① 在这里，邓小平同志对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1页。

思想路线的规定是层层递进的。首先，我们的思想路线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我们党正确的思想路线。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个别观点和结论，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其中根本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我们的思想路线，归根结底就是坚持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批评了那种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实事求是对立起来的观点，强调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根据现在的情况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使我们国家的政策和实行这些政策的步骤和方法合乎我们自己的实际。这就要求我们不囿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不固守已经过时的观点和体制，不搞超现实的方针和政策，更不坚持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也就是要求我们解放思想，调查研究，从实践中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为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南巡谈话精神，必须反对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

形式主义由来已久，表现多种。当前，在学习上，形式主义不在“深刻领会”上下功夫，不重在联系实际，搞清问题，而是照搬照抄，空谈重复，在学习时间和形式的安排上做文章。也有人不惜浪费时间和金钱去做无益于学习的事情，例如大批人员出动参观访问，甚至要重走一遍邓小平同志南巡的路线，似乎这样就能够做到“深刻领会”。此种形式主义有哗众取宠、应付差事之心，而无“深刻领会”、掌握“精髓”之意，是直接违背邓小平同志着力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的。学习上的形式主义由来已久。对此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特别提出学习要“管用”的原则，“少而精”的原则。我们应该记住这个原则，并要真正照办。为此需

要在学习上来一番真正的改革。

在工作上，形式主义不在“全面落实”上下功夫，不重在调查研究真抓实干，而是满足于开会传达、走马观花，发表一些不痛不痒的话了事。也有的人热衷于搞各取所需、短期行为和轰动效应，而不顾全局的、长远的利益。此种形式主义不是真正抓落实，而是做表面文章。

学习和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南巡谈话精神，要下很大的功夫。这是因为它具有多方面的深刻的内容。我们不仅要把这些内容一一搞清，这已很不容易，而且要把这些内容的内在联系和精髓把握住，这就更不简单。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朴实的，是说它是老老实实在地反映客观实在的道理，是实事求是的。但如没有求实的精神和辩证的头脑，也是不能掌握的。在这里，搞形式主义是无济于事的。而要清除形式主义，最重要的是要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当前障碍我们学习和落实的，有右的影响，也有“左”的干扰，而主要是“左”。“左”的东西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不易消除。无论是右还是“左”，都是主观主义。“左”的主要表现，是停留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停留在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认识上，停留在改革开放前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和政策上，总之，都是不从当前实际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都是主观主义。因此，主观主义的东西不消除，实事求是的精神进不来。而要消除主观主义，就要触痛自己，这决不是搞表面文章和空谈能够奏效的。当前的关键，是防止形式主义，防止主观主义，特别是着重防止以“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主观主义。（金守庚）

三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已经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提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引导我国现代化事业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他为我们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建立的新的历史功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国际风云变幻中能够经得起严峻考验，立于不败之地的最重要的原因。完全可以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及其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形成，标志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实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的飞跃。”这段话，完全符合客观实际，也是对邓小平同志历史功绩的高度评价。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找到了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建国以后，从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始终孜孜不倦地在寻找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筹划怎样使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更快地富强起来。经过艰苦的探索和实践，包括许多痛苦的磨难，这条正确的道路终于找到了。严格地讲，这条正确道路的确立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

战略转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决策,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集中精力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有的同志把十一届三中全会比作我们党的又一次“遵义会议”,这是十分贴切的。

1979年3月,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要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经过几年的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很快就显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得了丰硕的成果。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5条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决议》还初步总结了这条正确道路的主要点共十条,明确了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可以明显看出这十条主要点认真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初步勾画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轮廓。正是有了这样明确的方向和实践的经验,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这一科学的命题。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不断充实、不断展开的过程。第一，进入 80 年代以后，党中央进一步明确和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国情，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二，党的十三大，科学地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不仅论证了初级阶段的客观依据和科学含义，而且明确了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这样，就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个十分可靠的基础之上。第三，党的十三大制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是指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第四，党的十三大总结了我们党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的科学理论观点。后来，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十二条”，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规划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进的科学轨道。

诚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将不断地充实、不断地发展。但是，重要的是这条正确的道路毕竟被我们找

到了。

(二)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回顾一下建国以后 43 年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 1949 年到 1957 年上半年。这几年的工作是做得好的,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地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以及社会秩序,都呈现了新中国的新气象。

第二个阶段,从 1957 年下半年到 1978 年。这 20 年工作做得不好,虽然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不少成就,在各个方面也都有一些进步和发展;但是总的说来,国家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对外闭关自守,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导致不但不能发展生产力,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期间,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曾经犯过两次“左”的严重错误,一次是 1958 年的“大跃进”和共产风”、“浮夸风”,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第三个阶段,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现在的十多年。这十几年的工作做得是最好的,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个阶段是我们国家发展最好的时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综合国力有明显增强。最重要的是,我们党在这十几年间提出和逐步完善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把我们国家引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对比之下非常明显,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么“新”在哪里呢?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可靠基础之上,确保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沿着科学的轨道不断前进。

第二,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现代化经济建设。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从而能够集中精力把我国的经济建设搞上去。从现在看,这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最快,而且出现了良好的势头和前景,有可能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

第三,基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邓小平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和精心设计,提出了“三步走”的全新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达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现在,第一步已经实现,全国人民正在向第二步战略目标努力奋斗。

第四,这个阶段,采取了根本区别于过去那种“左”的政策的一系列新的政策。邓小平同志通过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并且强调这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新政策。他指出,改革包括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的改革,开放就是对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开放,对国内的各方面工作也要实行开放。他还强调,改革开放的政策必须长期坚持不变,至少70年不变,70年以后也不会变,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的整个发展过程。

第五,我们党通过十多年的实践,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了许多新的结论和阐述了许多新的原理,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及其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形成,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

实践已经证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是一条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始终不渝地走下去,一定会大大促进我国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促进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促进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三)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实现了新的飞跃

正确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科学的理论也来源于实践。由于我们党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一方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坚持有中国特色,并且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解决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这就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实现了新的飞跃。

第一,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果断地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和做法**,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且**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诚然,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阶级斗争,有时还表现得十分激烈,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但是,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

没有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竟然提出了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这样一种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观点。党中央明确指出，今后除了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那时仍然必须进行为战争所需要和容许的经济建设），决不能再离开这个重点。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党干部特别是经济部门的干部要努力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工作和科学技术。这是实现的第一个新的飞跃。

第二，从四个现代化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往往只提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认识上，比以前有了新的飞跃。这个新的飞跃，最早反映在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叶剑英同志国庆30周年的讲话中。这个讲话，不仅提出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且第一次明确四个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四个方面，并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部。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还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社会主义法制，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讲话还特别强调：“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样，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充实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把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位一体的奋斗目标。这是实现的第二个新的飞跃。

第三，从闭关自守到改革开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的国家基本上处于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可以说是“关起门来搞阶级斗争”，国家的发展停滞不前，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使原来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又拉大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提

出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强调: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发扬优势、革除弊端,大胆创新过程;我们的开放,要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优秀文化成果,引进外资,以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自力更生能力和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能力。我们一方面确认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另一方面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每项成就都是和改革开放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是实现的第三个新的飞跃。

第四,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产品经济模式,基本上不敢谈商品经济,似乎一提商品经济就和资本主义挂上了钩。这种思想认识和经济机制,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突破了这个传统观念。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使用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这次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又进一步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大胆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利用市场经济的机制,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这是实现的第四个新的飞跃。

第五,从贫穷的社会主义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的社会满足于平均主义,实际上是贫穷的社会主义,似乎“穷则革命富则修”,不敢“谈富”,不敢“致富”。到了“四人帮”横行的年代,竟然出现了“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

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荒谬说法。这是完全背离社会主义本质的。我们搞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全体人民过上美满幸福和富裕的生活。1985年3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次南巡重要谈话，邓小平同志又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和勤奋工作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帮助还没有富起来的，富裕地区扶助贫困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好体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而且本着这个目标来规划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实现的第五个新的飞跃。

总之，有了对社会主义科学认识的新的飞跃，就会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飞跃。我们深信，只要我们始终不渝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周锡荣）

四 我国国民经济必须有一个积极发展的速度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中指出,我国国民经济必须有一个积极发展的速度。自从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提出要加速发展的重要意见以来,大家对发展速度开始重视起来,但也存在一些疑问。对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我们确实需要加深理解。

(一)没有积极发展的速度,就不可能较快地缩小同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差距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在经济发展初期和经济恢复阶段,不同国家一般都经历了相似的较快发展阶段,奠定了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领域引人注目的位置。日本是由落后跃升为世界经济强国最为成功的例子。不管奇迹背后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秘诀,但有一点世人看法一致,这就是没有较高的发展速度,也就没有日本今天的辉煌。二战以后,日本国土满目疮痍,经济百废待兴,面对严峻形势,日本朝野在经济短暂恢复后,明确地意识到,振兴民族经济唯一出路就是加速发展。为此,1957年12月12日制定了“新长期经济计划”,1960年6月又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把经济高速增长纳入了国家的重要目标。在“新长期经济计划”中,日本政府明确提出,“一面保持经济的稳定,一面通过持续达到尽可能高的增长率,着实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使之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实践证明,日本较好地实现了上述承诺。195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仅为240亿美元,只及美

国的 6.1%，为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的一半左右，人均国民收入只有 198 美元，只占美国的 10%，占西欧主要国家的 20—30%。但在 1956—1973 年的 18 年中，日本经济以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快得多的速度高速发展。创造了令人瞩目的“高速增长”时期。这一时期工业生产增长 8.6 倍，每年平均增长 13.6%，到 60 年代末，日本已赶上并超过西欧主要发达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里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

我们周边国家和地区蒸蒸日上的高速发展态势，更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借鉴。亚洲“四小龙”1965—1980 年年均增长超过 8%，有些年份连续超过 10%；1981—1990 年，亚洲“四小龙”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仍达 8%，其中南朝鲜每年的增长率最快，为 8.8%；继 80 年代亚太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1990、1991 两年中，东南亚各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仍然不减。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在整个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四小龙”的经济增长速度 1990 年为 6.6%，1991 年为 6.3%。另一项统计显示，近两年东盟 7 国的经济增长率更高，1990 年为 7.4%，1991 年为 6.5%。并且各国根据经济发展新形势，正在实施更加宏伟的加速增长计划。据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新加坡经济策划委员会制定出的新加坡中期经济目标是达到高水平的持续经济增长，力争到 2030 年，年人均国民总产值达到 49860 美元，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泰国将实施第七个五年计划，力争使本国成为亚洲“第五小龙”，1992 年至 1996 年间，泰国经济增长率预计年均均为 8.2%；新近当选的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同样雄心勃勃，他提出要尽快结束落后于东盟其它成员国和亚洲“四小龙”的局面，赶超邻国和改善穷人生活，他清醒地认识到，菲律宾的时间不太多，必须在今后 6 至 10 年内，实现这一愿望。不难看出，处于新的转折关头的周边国家正不遗余力的通过高速度来实现国家的

宏图大略。

比较我国和其它国家的发展速度,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不能同发达国家时下的低速比,而应和初期及恢复阶段比。因为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的潜能已经被充分发掘出来,现在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更大努力和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西方经济在经过粗放式的大发展后已经进入产业调整、结构优化等内含为主的低速发展轨道,而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才刚刚起步;同时西方国家经过长足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基数很大,他们每年2—3%的增长速度,也许能和我们6—7%的增长速度创造的价值一样大。所以,我国的经济增长如果和西方国家相差不多,或者只高于这些国家2—3个百分点,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在实现高速度。要逐渐缩小同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必须获得美、日等国高速发展时期的高速度,甚至要高于他们的速度,这是我们缩小同发达国家差距的基本条件。二是尽管现在理论界对中国和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可比性提出怀疑,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没有速度就没有经济的腾飞。不管周边国家和地区有什么样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有什么样的历史机遇,在发展速度这一标准面前,我国和它们都是平等的。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无论经济发展的条件是好是坏,都必须把速度放在重要位置,否则速度跟不上,不仅不能迎头赶上,还会进一步扩大差距。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开足马力,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变不利为有利,寻找各种突破口,能搞多快就搞多快,保持积极发展的速度,不为经济增长速度设置种种人为限制。只有这样才谈得上缩小和世界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才谈得上提高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实力和地位。

(二)没有积极发展的速度,人民生活水平就不能大幅度提高,增强综合国力也是一句空话

邓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最近的重要谈话、讲话,在肯定了3年治理整顿成就的同时,对1984—1988年经济的高速发展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一看法对我们正确对待速度问题打开了一条新思路,有助于在速度问题上突破传统认识上的误区。统计数字显示,80年代后期是我国经济发展步子比较大的时期。和增长较快的开放初期比较,1979—1983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9%,1984—1988年则平均增长11.5%。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均有显著增强,其中煤炭、电视机、水泥、原油、化纤产量在世界上排名都前移了,煤炭、水泥、电视机上升到世界第一位,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人民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居民货币收入由1983年的2639.1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8898.7亿元,居民消费水平由1983年的289元增长到1988年643元,城乡储蓄存款由1983年的892.5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3801.5亿元。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没有经济实力的增强,那么停下来搞治理整顿非把国民经济拖垮不可。正因为有了高速发展的大背景,才能使治理整顿环境宽松,有条件把国民经济的基石锤炼得更加扎实,为经济的下一次腾飞插上坚强的翅膀。尽管高速发展有可能产生某些负效应,但总的看利大于弊。治理整顿不是目的,并且治理整顿也不允许时间过长,在激烈竞争的世界经济中,国民经济发展慢了不行,停顿不前更不行,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缓冲,经济发展一定要重新加快速度,跃上“新台阶”,向下一个目标奋力前进。

国家信息中心的研究人员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速度提出了

种种设想,并对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了预测。这一研究对我们理解速度的重要性有积极意义。这里包括4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第一种,按照“八五”计划确定的6%的年均增长速度计算,到本世纪末,将可实现20年内翻两番的目标,但由于这一速度不及“四小龙”9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与这些国家的差距还会拉大,也就是说尽管中国自身国力有较大增强,但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没有改善,甚至有所下降;第二种,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这将使国民经济增长在90年代内再翻一番。这一速度将基本与“四小龙”的平均年增长率持平,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水平的相对差距不变,这一速度也不利于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第三种,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2%,这将保证90年代国民经济翻一番的目标提前一年实现。这一速度正好与南朝鲜以及泰国等增长较快国家的发展速度相同,表明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水平的相对距离有所缩小;第四种,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这将保证90年代国民经济翻一番的目标提前两年实现。这一速度高于亚洲“四小龙”和周边国家,使我国与上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差距进一步缩小。

不同的发展速度,对我国国民经济实力以及国际经济地位影响差异很大。所以,创造条件,寻求积极的发展速度,力争更快更好,是我们必须做出的正确选择。

(三)我国具备了国民经济保持积极发展的速度的国内外环境,并且实践证明也是可行的

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近期战火不断的南斯拉夫局势、捷克和斯洛伐克分裂,局部动荡和冲突并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消失;南北矛盾、

东西矛盾的发展趋势出现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但从积极意义上看,国际环境对我们扩大开放的有利因素也不少。形成一致认识的是:苏联作为两极格局的一极消失了,现在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和美国争夺霸权,资本主义内部矛盾也没有激化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亚太地区相对安定,是发展的天赐良机;世界经济竞争加剧的同时,相互依赖也在加深,经济贸易合作将进一步扩大;世界经济中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浪潮持续高涨,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等等。如果说,上述这些有利条件是从较长期来分析,那么从短期看,另一个重要因素也不容我们忽视,即世界经济正在复苏。世界经济复苏对我们是挑战还是机遇,理论界并没有统一认识。不过,我们应突破一种传统看法,就是西方危机有利于我们迎头赶上,西方复苏扩大了我们和西方的差距。实际上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就是西方复苏有利于推动整个世界经济走入上升期甚至较快发展。这里的关键所在是经济的国际化。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种对西方危机、繁荣的传统看法应当改变。世界的繁荣和稳定、萧条和动荡直接影响每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从这一角度看,西方的复苏对我们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并且这种机遇比诸如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等较长期机遇更难得,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因为它短则1—2年,长则4—5年,转瞬即逝,如不抓住,后悔莫及。

从国内情况看,我国不仅具备了积极发展的前提条件,如:国民经济实力基础更加雄厚;经过治理整顿,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价格相对稳定;积累了“高速发展”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日益完备,等等。而且从理论上分析,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是可能的。国家体改委的研究人员,通过投入产出模型、经济仿真模型,以及冯·诺意曼的大道定理三种主案对比论证,认

为 90 年代的中国经济应该是高速增长时期,上述三种方案的立足点和计算方法是不同的,但都得出了同一个结果,即 90 年代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在 8%—10% 之间,这说明这一增长速度在理论上的论证还是比较充分的。

可以看出,我国已经具备了加速发展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同时从实践结果看,国民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速度也是可行的。从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至今,才短短几个月时间,中国改革开放呈现出新面貌,出现了万马奔腾的可喜景象,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具体表现在:

第一,沿海地区、长江流域、周边省份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在辽东半岛、渤海湾、山东半岛、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珠江三角洲等建立了 6 大经济圈,开辟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 5 大经济特区,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等 14 个城市,成立了南通、宁波、福州、上海浦东等 5 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开放地带遍及 1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总面积达 42 万平方公里,形成了一个月牙形的面向太平洋,辐射其它大洋、大洲的态势,并已逐步成为内地企业和国际市场的联系纽带和桥梁。长江流域是整个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我国相继作出了一系列促进长江流域全面开发开放的重大决策,在确定长江流域 6 片地区为全国重点综合开发地区后,长江沿岸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 5 个内陆城市也向世界敞开大门,至此,长江沿岸 10 个主要中心城市全部对外开放。最近,内陆边境地区又成为对外开放新热点,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等内陆边境省区以内地为依托,以 32 个国家重点口岸和 200 多个地方口岸为窗口,已形成了以俄罗斯、蒙古及东欧为对象的北部开放区,以巴基斯坦和西亚诸国为对象的西部开放区,以及以印度、尼泊尔、缅甸、老挝、

越南和孟加拉国等为对象的南部开放区。不久前国务院又决定在满洲里、黑河、绥芬河和珲春 4 个边境城市建设边境经济合作区。中国经济已经出现的沿海、沿江、沿边有重点、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必将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第二，今年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在正常范围内以较高速度发展。1—5 月份，全国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7.9%；城乡市场购销两旺，进出口形势继续保持较好势头。财政收入也有所增长。全国各地，特别是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经济加速发展势头很猛，根据经济部门预测，今年国民生产总值原计划增长 6% 的目标将被大幅度超过，估计可能达到 9%。

第三，外商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外资大幅度增加。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增强了外商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乐观情绪。今年头 5 个月外商对华投资势头强劲，全国新批准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8926 个，比去年同期增长 1.5 倍以上，相当于去年全年的三分之二，协议外资金额 104.5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7 倍，为去年全年的 87%。

上述几个方面初步显示，中国经济具备加速发展的巨大潜力，随着扩大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必将迸发出更大的活力。

(四) 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这里的“积极发展的速度”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经济发展必须有较高的发展速度，能搞多快就搞多快，切不可过于求稳而丧失时机，迈不开发展的步子；二是积极发展的速度不是片面追求产值、指标和片面扩大基建规模，而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产

品更新换代,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外资、提高企业素质等方面来实现的,这样获得的速度才是又快又好的速度。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同志在阐述这一思想时指出,经济发展不但要看增长速度,而首先要看经济是否良性循环,只要是产品有市场,效益好,那么速度快也不会出问题,如果产品滞销,企业亏损,那么即使速度慢,依然不可靠。

第二,加速经济发展,不能搞“一刀切”,有条件快一些的就快一些。我国是个大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此经济发展的速度,必须符合各地情况,坚持实事求是。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地区,发展速度可以快于全国平均水平,条件差的地方,也不要超越自己的能力,急于求成,反而事倍功半。

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同志最近在浙江考察时指出,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并带动毗邻地区。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要以浦东为龙头,以江浙为腹地,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浦东的作用,发展得更快一点,同时又要利用江浙的优越条件,做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并具体指出,浙江的绍宁沿海地区和杭嘉湖平原有良好的基础,在政策上可以更放宽一点,发展可以更快些,并带动浙西等地的发展。

所以各省、各地区的发展速度要符合省情、区情,有条件的可以快一些,没有条件的可以慢一些,切忌一轰而上,走高速无效低质的路子。

第三,搞好大中型企业是积极发展的速度能否实现的关键。经济能否高速增长,取决于占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是否充满生机和活力。所以不失时机地深化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是我们赢得积极发展速度的重要环节。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根本措施,是全面贯彻执行《企业法》,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推动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加快走向市场,实

现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大中型企业搞活搞好了，积极发展的速度才有强大的物质基础。

第四，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是实现积极发展的重要条件。市场机制能否尽快建立起来，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各个组成部分能否很好地良性循环起来，影响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4环节是否畅通。市场机制的完善，包括建立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市场机制建立起来才能有效解决政企分开，政府宏观调控和企业微观搞活的问题，使经济发展建立在高效、高质、高速的基础之上。

中国新一轮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已经来临。我们一定要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真抓实干，少说空话，鼓实劲，出实效，力争使经济更快更好地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张素峰)

五 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我们加快 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正确估量国际和国内的形势,是我们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依据,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国际风云变幻中能经得起严峻考验,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在当前国际形势变化剧烈和复杂的情况下,江泽民同志对国际和国内的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他指出,综观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们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经济发展有利条件不少。那么,有哪些有利条件呢?

首先,从国际上来说,可以争取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为加快我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条件。

(一)当前世界正处在新旧格局的交替过程中,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标志着世界两极格局已经结束,新的格局尚未形成,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世界各种力量在分化与重新组合,新旧矛盾交织发展,天下仍然很不太平。国际经济竞争日益加剧,南北矛盾更加突出,民族矛盾激化,地区冲击不断。和平和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主题,虽然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我们可以争取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这种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利于加快我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经济发展。

(二)西方大国矛盾重重,自顾不暇,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短时间内难于联手集中对付我们。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大国穷于应付,既要解决东欧、独联体出现的新的危机,又要解决西方国家内部新的政治矛盾和经济摩擦。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利用矛盾的广阔的回旋余地。

(三)我们同所有周边国家建立了友好睦邻的关系,这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为我国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经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苏联解体以后,解除了来自北方的直接军事威胁。我们与原苏联各共和国不仅保持了正常关系,而且边境贸易也日益繁荣,迅速发展。朝鲜半岛出现了缓和趋势,朝鲜北南双方已由军事对峙转向和平谈判。柬埔寨已经走向了政治解决的轨道。阿富汗尽管内部还有些矛盾,也朝着政治解决的方向前进。东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富有活力的地区,1991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以上,大大超过世界经济增长不到1%的水平。周边关系的稳定,为我国发展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从国内来说,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和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大大增强了我国经济实力。三年多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增强了综合国力,人民得到了更多实惠。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为3482亿元,1991年已增加到1958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与1990年相比增长7%左右,与世界经济出现不景气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粮食1978年为30477万吨,1991年增加到43524万吨,居世界第一位。钢产量1978年为3178万吨,1991年增加到7057万吨。对外贸易,1978年出口总额为97.5亿美元,1991年增加到719亿美元,1978年进口总额为108.9亿美元,1991年增加到638亿美元,1991年出大于进124.5亿美元。人民生活,全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收入1978年为316元,1991年已增加到1570元,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978年为134元,1991年增加到710元。城乡人民储蓄1978年末为211亿元,1991年末增加到9110亿元。这十多年的建设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为加快经济发展创造

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理论上,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我们加快改革开放和加快经济发展的指针。在实践中,经过十多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格局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是:

第一,打破了以前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所有制结构;

第二,打破了过去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建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结构,允许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裕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打破了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初步建立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第四,打破了过去闭关自守的格局,建立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和向沿江、沿边、内陆省区推进的,全方位的,多元化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三)三年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为加快改革开放和加快经济发展,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

三年来,经过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和共同努力,治理整顿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主要表现是:

第一,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经济秩序明显好转。采取了增加总供给和抑制总需求的措施,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保持了基本平衡,物价指数不断下降,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高达18.5%,1987年下降到17.8%,1990年下降到2.1%,1991年为3%。市场秩序明显好转,商品供应丰富,花色品种增多,质量有所提高,部分商品已出现买方市场,消费者选择余地较大,居民

消费心理已趋于正常。

第二,工业持续增长,农业连年丰收。1989年——1991年工业总产值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8.5%、7.8%、14.2%。农业虽然在1991年部分地区遭受百年未遇的水灾,但是还获得了连续三年的丰收。

三年来,改革开放迈出了新的步伐,主要表现在认识上,对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构思进一步深化了。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现在有的同志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在工业改革方面,进一步建立了国营企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完善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提出了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的改革措施,进行了股份制的试点;在农业改革方面,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健全和完善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发展了服务体系;在价格改革方面,调整了城镇居民定量平价粮油销售价格,提高了部分基础工业品的价格,部分产品实行了计划内外的两种价格的并轨和缩小差距;扩大和加快了住房制度的改革,进行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试点;计划体制、流通体制、金融体制改革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在对外开放方面,建立了海南省经济特区与上海浦东新区,新开放了南宁、昆明、黑河、满洲里等边境城市,新开放了武汉、重庆等内陆沿江城市,截至1992年6月19日,我国已有799个市、县对外国人开放。改革已深刻触动了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正在形成。为今后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资金条件。

(四)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安定团结,为加快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平息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使我国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人民团结，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

(五)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建设和改革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和加快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过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广大干部和群众得到了锻炼，提高了认识，增长了才干，得到了实惠，增强了承受能力，改革已深入人心。人民支持改革，积累了许多丰富经验，主要有：关于坚持改革必须立足本国，走自己道路的经验；关于判断改革得失成败标准的经验；关于改革胆子要大一些，敢闯，敢于试验的经验；关于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经验；关于坚持“两手抓”的经验；关于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验；关于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关系的经验；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关系的经验；关于调整物价与控制通货膨胀关系的经验，等等。这些经验，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

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我们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充分认识和利用上述这些有利条件形成的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加速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放过这些有利条件和时机，没有新的发展和新的作为，那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徐焕章)

六 加快经济发展必须更新观念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明确强调,在加快经济发展的问题上,要更新观念。不要一讲加快发展,就走到过去那种片面追求产值、指标和片面扩大基建规模的老路上去,主要应向深化改革、推动技术进步、增加高质量的新产品、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提高企业素质等方面,去争速度要效益。这样实现的发展速度,就会是又快又好的速度,不会有大的风险。

自从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传达以后,各地都在努力加快经济的发展。但是,如何理解“发展”,“发展”应当是什么意义上的“发展”,在许多人的认识上还存在误区。江泽民同志提出在这个问题上“更新观念”,就是要更新那种把“经济发展”片面理解为基本建设规模宏大,追求产值、产量增长速度的旧观念,确立“发展”必须是效益与速度相统一的“发展”的新观念。这种观念转变,包含一系列深刻的内容。

(一)变速度型发展战略为效益型发展战略

由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左”的影响,以及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所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基本上是片面追求高速度的速度型发展战略。其主要特征在于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急于求成情绪。即在经济工作中,为了达到某种

政治要求和政治效果,从各个环节上不计成本地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并把这作为制定计划和衡量工作成绩的标准,力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再高速”。这种速度型发展战略的实施,虽然也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但代价是巨大的。其结果是,虽然生产发展速度较快,但经济效益提高不快,甚至出现负效益,不能保证人民生活有相应的改善;虽然社会总产品和总产值增加了,但许多产品质量不高,品种单调,不符合市场需求,造成积压与短缺并存的矛盾现象。总之,这种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速度型”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带来的是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惊人浪费,而且在客观上促使人们形成一种单一追求速度的不正确的“发展观”。因为,在评价国民经济形势和衡量企业经营水平时,都是以增长速度为标准的,因此,不能不使人们把增长速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标志,从而片面追求高产值、高指标,而忽视经济效益。

根据我国的国情特点,提高经济效益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我国的现实条件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资金严重短缺,而且经济活动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或者说经济活动许多矛盾的焦点就在于经济效益太低。因此,只有在提高经济效益上下功夫,才能缓解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矛盾,趋利避害,使经济获得稳步、协调、高质量的发展。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总结以往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多次强调必须把经济工作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

要实现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转移,首先必须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摒弃过去那种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的“左”的指导思想,确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指导思想。早在1987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就指出:“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

得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如果不切实际,靠脑子里面的幻想来制定政策,制定发展的规模,那船是要沉的。”^①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是受经济条件制约的,因此,必须根据国情条件与国力基础来规划发展战略,这应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指导思想。

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提高经济效益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没有效益的速度,不能称之为“发展”,而只能是资源的浪费。因此,在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上,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以效益提高为前提,速度必须服从效益。必须在全社会形成这样的共识:我们所要达到的,是在提高经济效益前提下的速度,而不是只求速度,不顾效益。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②“有些不切实际的和对整个经济害多利少的高指标要坚决降下来”。^③“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④在今年年初的南巡谈话中,他又进一步强调,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要扎扎实实,讲求实效,稳步协调地发展。要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

可以说,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也逐步由过去那种片面追求产值、产量增长速度的发展战略,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保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十三大报告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

①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第22页。

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页。

③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47页。

④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22页。

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步增长”的战略。其后,党的历次文件都坚持了这一方针,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强调必须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把科学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放在突出位置,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我国目前“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指导思想基础上,并体现这个指导思想主旨的。

但不应回避的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效益低下仍是困扰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而且,许多人也一时难以从旧有的“发展”观念中解脱出来,因此必须对经济发展战略观念真正转变的艰巨性有足够的估计。不仅如此,还应当看到,在现实中真正实现从速度型发展战略向效益型发展战略的转移,我们还面临一系列艰巨的任务,它要求在宏观、微观管理体制和方法上,在科技进步上、在对外开放、国际市场竞争中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素质。而这一切的实现,绝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

我们强调由原来单一追求速度的发展战略向全面追求效益的发展战略转变,并不意味着对速度有任何忽视。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政治条件和发展环境,要求我们必须加速经济发展,我们所强调的只是这种积极发展的速度必须是以高效益为基础的。

(二)变粗放型增长为集约型增长

在经济增长方式上,有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之分。所谓粗放型增长,就是依靠生产规模处延的扩大,靠大量投入资源而获得产出量的增加。是一种单纯的量的增长。集约型增长指的是靠改进技术、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产出量的增加。是一种质和量相统一的生长。过去,我们一直采用

的是“广种薄收”粗放型增长方式,即便现在,我们也还不能说已走出粗放型发展阶段。据统计,我国亿元国民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系数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发达国家的5至6倍。原材料利用率也大大低于国际水平。例如,我国钢的成材率是82%,而发达国家一般为92%;木材出材率为60%左右,发达国家为80%左右。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由于人口众多,因此,人均资源状况相对不足,有的资源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例如,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是5.5亩,而我国人均不足2亩。这样的国情特点,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走出粗放增长的沼泽,而走上集约型增长的道路。正如十三大报告所指出的“技术落后,管理落后,靠消耗大量资源来发展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归根到底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

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实质上也就是从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变为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就是通过依靠科技进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加强管理来提高产品质量,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经济获得高质量的发展。为此,必须注重做好以下工作。

必须加速科技进步。为了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量,唯一的出路在于加速科技进步,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企业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当今时代,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越来越大,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技进步。据统计,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因素所占的比重大约为50—70%。当前国际舞台上的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在这方面,我国是远远落后了,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因素只占20%,这说明,我国国民经济的生长主要是靠资金、人力的投入取得的。因此,必须改革科技体制,加速科技进步。我国目前的科技工作重点,是推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

造。在主要为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服务的同时,还要组织精干力量开展高技术研究,继续加强基础研究,为国民经济下一步的发展作好必要的科学技术储备。总之,就是要通过科技进步,提高企业内含扩大再生产能力。

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便是根据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和内在逻辑,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高度。即在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加深国民经济工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科技水平的基础上,提高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在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素质的基础上,提高制造加工业的深度,提高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比重,降低初级产品的比重。因此,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进程,本质上便是效益提高的进程。真正有效的经济发展应当体现为经济结构的高度和结构效益的不断提高,而不是仅仅体现为规模和数量的扩张。我国以往经济发展中之所以效益较低,重要的原因便在于产业结构不合理,严重削弱了国民经济的效率,进而对实现发展目标带来不利的影响。可以说,结构失衡已成为束缚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要使粗放型、外延型为主的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内含型为主的增长,必须花大力气调整产业结构,把产业结构的确立和运动真正纳入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进程,向结构演进要结构效益、要发展速度。而产业结构的合理演进,不仅需要对今后的投资增量的投向进行结构调整,而且需要对已形成的结构存量进行调整,大力推动现有结构矛盾的解决;不仅需要加强市场机制的培育,把产业结构的运动纳入市场机制约束,以保证产业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的适应性,保证产业素质和竞争力的提高,而且需要宏观产业政策的指导,使结构演进的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市场微观效益与长远宏观发展效益统一起来。

(三)变封闭式发展为开放式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上的封闭,主要表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整个国民经济对外的封闭;一是国民经济内部各个方面、各个企业、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相互间的割裂和封闭。经济封闭性的深刻根源在于经济商品化、市场化、国际化水平低。要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企业活力与素质,就必须更新观念,用市场竞争冲破经济封闭的大门。使企业面向市场,使国家面向世界。改革开放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完成这个使命。

把企业推向市场。在我国,企业尤其是国营大中型企业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仍然是机制不活,后劲不足,经济效益不高。解决的办法,从企业内部讲,主要在于加强科学管理;改革经营机制;加强技术改造。而这三方面任务的实施,都有赖于企业的开放发展,即把企业推向市场,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因此,企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受市场法则的规定与制约,而企业自身也必须使自己的经济行为自觉地适应市场要求,否则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市场通行的是优胜劣汰的规律,这对企业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企业为了在市场中取胜,就不得不根据市场的要求,精心经营、讲究效率、更新产品、开拓市场,通过优胜劣汰,对企业加以锻造,能够提高企业的总体素质,提高社会的总体效益,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除此之外,为了使企业获得真正开放发展的条件。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育社会主义市场,规范市场秩序,使企业能够在市场上平等地、充分地竞争。

使整个国民经济面向世界。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国际间经济往来、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各国的现

代化和经济发展越来越在国际竞争、国际分工、国际往来中实现。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①因此，我们的经济发展必须面向世界。为此，首先必须积极而稳妥地利用外资。利用外资是开放发展的重要途径。建国之初，由于指导思想方面的原因，即认为利用外资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加之当时客观存在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在我国经济建设的资金来源中，外国资金的比重很小，而且利用外资的方式单一，主要采取“延期付款”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再指出，为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我们鼓励外资流入，同时，要积极对外资流入的流向结构加以引导，力求最大限度地缓解资金不足的矛盾。邓小平同志就多次谈到，我们要创造条件，多吸收外资，要“吸收外国资金、技术，甚至欢迎外国企业到中国办工厂。”^②目前，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是通过借用外债；二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到1991年10月底，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已达731.2亿美元，其中借用外债511.8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219.4亿美元。为了提高外资使用的综合经济效益，使其向较高层次发展，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在于：一是转变观念，克服“恐资”心理，充分认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外国资金的重要意义。二是确定适当规模。利用外资的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不仅要考虑国内资金和物资的配套能力，而且要考虑偿还能力。实现利用外资条件下的综合平衡。其三是保持合理结构。为了防止还债期过分集中，推迟还本付息高峰，外债结构必须合理，特别是控制利息率比较高的短期贷款和商业贷款的比重。四是不断完善利用外资政策，建立和健全涉外经济立法。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77页。

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7页。

五是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使我国的企业、产业、产品、技术真正进入国际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按照国际竞争原则改进我们的企业管理、外贸体制,调整产业结构,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素质。

经济发展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它规定并影响着其他各方面观念的转变。同时,发展观转变的实现也有赖于其他各方面观念转变的进程。一定的发展观规定着一定的经济体制的选择。高积累、高速度、高指标、大规模、重“重工”的非均衡发展观,客观上就要求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作为制度保障。而高效益、高速度、高质量的效益型发展观,客观上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来实现。所以,当前我们要真正实现效益——速度型的发展,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强化开放,用改革开放来推动经济发展。那么,随之而来,各方面观念更新的任务也愈益复杂与艰巨起来,对此,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认识与准备。

(李庆华)

七 发展经济“要走给下面放松的路， 不要走给下面卡紧的路”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在谈到加快经济建设的发展时说：“总起来说，就是小平同志所要求的，要走给下面放松的路，不要走给下面卡紧的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样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论断，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关系到我们敢不敢在当前时不我待的机遇面前，放开手脚，依靠群众，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问题。

（一）“走给下面放松的路”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变革，都是对生产力的一次解放。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应当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快。社会主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生产力的主体。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力的总体水平必须靠“下面”，靠企业。这就不能把企业卡紧。还要看到，发展生产力不能只是维持简单再生产。马克思指出，社会化生产的特征是扩大再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扩大再生产可以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国家集中资金，开新项目，铺新摊子；一种是靠现有企业的更新、改造、扩建。在工业化初期，靠第一种途径是必要的，但新企业建成后，也应当使它具有更新改造的能力；当基本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之后，扩大再生产就主要应当靠第二种途径。

而实现第二种途径的重要条件就是“走给下面放松的路”。可是，长期以来，国家对企业管得太多，走了一条“给下面卡紧的路”，结果是企业建成一个就逐渐老化一个，效益低，消耗高，社会供需矛盾突出。究其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从理论上说，是把对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同国家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没有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从实践上说，是把国家管理经济，当成政府机构直接参与和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直接指挥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等具体活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包揽了许多本来不应该由它们管理的事情。这种状况，不仅挫伤了广大企业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造成生产力发展缓慢，而且还妨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因此，要加快发展生产力，就不能“走给下面卡紧的路”，而“要走给下面放松的路”。

“要走给下面放松的路”，就要对把企业卡得很紧的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说过，过去我们的经济体制很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①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又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改革经济体制，要找准突破口。对于这一问题，邓小平同志一贯认为要对企业放权，给下面松绑。他说：“权力不下放，企业没有自主权，也就没有义务，搞得好坏都是上面负责。全部由上面包起来，怎么能搞好工作，调动积极性？”在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指导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城市改革的中心环节，而且明确提出要使企业具有自我改造、自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0）》第140页。

我发展的能力。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决策的。按照马克思再生产的理论,剩余劳动转化为资本就是积累。企业改造、发展的过程,就是积累的过程。对企业“放松”,让企业具有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就是让企业走自我积累的道路,即让企业在完成上缴税利的前提下,用自己积累的资金,尽可能地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提高技术装备的现代化水平,使资金在生产过程中增殖,积累更多的资金再投入。这样,不断地投入,不断地产出,不断地增殖,像“滚雪球”一样,资金越聚越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不断增强,直到实行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经营,使大工业的无限扩展力得到充分发挥。让企业尽其所能地多创造产品,并尽其所能地发展,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要求的“要走给下面放松的路,不要走给下面卡紧的路”的实质所在。

“走给下面放松的路”,企业会越来越活跃,会不会引起宏观经济的失控?这种将搞活企业同宏观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很不妥当的。其实,宏观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关键第一要有质量,第二要有市场,第三要有效益。企业搞活了,手脚不再被捆住,就会提高产品质量,开拓市场,注重效益,从而增加社会总供给,满足社会总需求。所以,防止宏观经济失控的根本点是搞活企业,“走给下面放松的路”。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几次大的比例失调,都是在计划高度集中对下面卡得很紧的情况下发生的。现在,企业开始活了,突破了以往包罗万象的计划的框框,这是好事。即使出现一点问题,比如说出现总需求超过总供给,需要作一些必要的调整,只要不伤害经济运行机制,这种调整就会是在总供给进一步增长基础上进行的调整,从而打破原有的总量平衡,实现新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使整个国民经济上一个台阶,这是符合规律的现象,是完全必要的。

(二)“走给下面放松的路”体现了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走给下面放松的路”，不仅是搞活企业、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它还涉及到经济建设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体现了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力量。

第一，发展经济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经济的发展首先是个群众积极性的发挥问题。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者的一种解放，它更能够发挥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同资本主义社会比，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更能够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90年代是非常关键的。这10年经济发展得快慢，改革开放搞得如何，直接关系到能不能使社会主义有一个强大的物质基础，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为此，我们必须把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列宁指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①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是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动力源泉。“走给下面放松的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和职工对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善无能为力的状况，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第二，必须依靠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管好我们的国家。过去我们依靠人民群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依靠人民群众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现在，我们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9页。

管理国家,也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邓小平同志曾再三告诫“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①人民的国家要由人民来管理,人民不仅要从政治上治理国家,还应当管理经济。“走给下面放松的路”,就是让企业和职工管理经济,不仅管理微观经济,宏观经济管理也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政策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掌握才能发挥威力。宏观经济只由国家机关少数人去管理,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也是管不好的。

第三,上层建筑必须为经济基础服务。国家机关作为上层建筑,应当为经济基础服务。我国现在各级行政机构之庞大古今中外所未有。这必然导致人浮于事,职责不清,对自己行使的权利不承担责任的状况。这种状况,不利于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依靠群众,不可能很好地为经济基础服务。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要求“通过机构改革、精兵简政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提高决策效率和办事效率”。“走给下面放松的路”,将会引起国家管理职能的变革,使国家机关工作真正转到为基层、为企业、为生产服务的轨道上来。

(三)落实“走给下面放松的路”需要做认真踏实的工作

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经济“要走给下面放松的路”的重要论断,对我们深入理解依靠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力有很大的意义,为深化改革提出了一个总体要求。当前的任务是要抓好落实,不是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02页。

口头上而是真正地“给下面放松”，这需要认真做大量踏实的工作。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在落实“走给下面放松的路”时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政府要积极转变管理经济的职能。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在组织和领导人民生产的事业上，我们也并非万事如意的。主观主义和粗枝大叶的毛病，妨碍了不少工作的进步。”^①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中央经济主管部门要深入下去，帮助地方和企业进行分析和研究，找到搞好企业的路子，并为它们加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切实搞好服务，改进宏观管理。根据以上指示精神，要下决心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从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转到培育、管理市场，逐步建立起有效的、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管理体系。我国国营企业改革虽然早已明确了政企职责分开的方向，但成效不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变滞后。正是因为各级政府部门仍然以组织国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为主要任务，因此，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能落到实处，行政干预不能消除。政府部门种了企业的地，荒了自己的田，一方面管了许多管不好、管不了、不该管的事，另一方面却没有把自己的职能转变到面向全社会进行行业管理和社会服务方面来。为此，必须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转变，必须适应“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围绕“走给下面放松的路”，一方面要积极推进计划、投资、财政税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建立有效的综合运用经济杠杆的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包括生产资料、消费品、劳务以及金融等市

^① 《邓小平文选(1938—1965)》第83页。

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完善市场交易法规和管理制度,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总之,政府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规划、协调、服务、监督上来,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切实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切断企业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把企业推向市场。这是为适应发展经济的需要对上层建筑的一次深刻改造。这一重大改革的实现,必将为胜利完成我国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实现发展国民经济第二步战略目标提供坚实的体制保证。

第二,企业要积极转换和完善经营机制。“走给下面放松的路”,企业自主权随之扩大,其责任也随之加重。如果这时企业不积极转换和完善自己的经营机制,而是继续依靠减税让利,不仅国家财力不允许,也不利于引导企业面向市场,加强管理,增强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能力。从领导机关来说,要“走给下面放松的路”,从企业来说,就要主动地创造性地来走这样的一条路。这些年来,通过改革,我国各地、各部门出现了一批搞得很好的企业。这批企业底子厚,技术力量强,管理严格,产品和服务不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上都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这类企业大体在全国占三分之一左右。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有相当一批企业缺乏活力,难以按照市场的需求组织生产,还有三分之一的企业亏损。这类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是经营机制的不完善。因此,在当前和今后的企业改革中,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在促进经营机制的转换和完善上下硬功夫,使企业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和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同时,在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放手让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经济效益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的要求,组织生产

经营活动, 在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 使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真正做到中央工作会议所要求的“产品有竞争力; 技术有开发力; 资产有增殖力; 对市场有应变力; 领导班子有团结进取力; 职工群众有凝聚力”。只有这样, 才能使“走给下面放松的路”收到实效。

第三, 积极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改革开放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 对外开放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吸收别人的先进成果和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资金, 而且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 特别是宏观经济管理经验, 为我所用。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邓小平同志告诫大多数干部要“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 一个是学经济学, 一个是学科学技术, 一个是学管理”。^① 并指出: “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 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 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 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② 如果外国的管理经验对于落实“走给下面放松的路”是有效的, 我们就应该学习、借鉴和吸收。有些人对学习外国管理经验戒心太大, 原因在于把外国东西等同于资本主义。其实, 管理具有二重性, 这是马克思早就阐明过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宏观管理其宗旨是为调整资产阶级利益、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服务的。但不能不看到, 它的各种运行机制和调节手段, 却为资本主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和活力的发挥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我们应该大胆地学习, 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改造和利用。

第四, 要在经济上关心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 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走给下面放松的路”, 必须处理好国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43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4页。

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必须明确，没有企业利益，企业就不能自我改造和发展，不讲职工利益，就摆不正生产与生活的关系，而没有企业和职工这两个积极性，也就没有国家利益。“走给下面放松的路”，要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依法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权利。当前，分配领域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尚待解决，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仍然存在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弊端。为此，就需要通过深化改革，革除那些不利于群众积极性发挥的东西，来激发和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发展。

（李世华）

八 改革也是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改革原有体制，是为了清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使生产力进一步得到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是一次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把改革提到革命，提到解放生产力这样应有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思想，这个重要思想把改革的性质、目的、意义，讲得更完全更透彻了。

（一）正确理解解放生产力的科学含义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个观点所讲的，主要是指革命的阶级通过暴力革命从根本上变革维护旧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然后运用政权的力量改变作为生产力发展障碍和桎梏的旧生产关系，代之以新的生产关系，从而使生产力，主要是劳动者获得解放。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已为历史实践反复证实。例如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历史进程。

但是，解放生产力的革命，并不都具有暴力性质。这里要弄清解放生产力这一命题的科学含义。所谓解放，是相对于束缚而言的，解放就是打破束缚，解放生产力就是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体制或机制，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在现实社会中，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基本的社会制度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一种是社会基本制度的某些具体表现

形式即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束缚,表现为两种根本不同的情况。前者必须改变社会的根本制度,用新制度取代旧制度,后者只改变根本制度的具体形式,属于社会制度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前者要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后者则需要通过改革手段来实现。不能把解放生产力的两种含义混为一谈,不要以为一提解放生产力就一定是否定社会根本制度。

(二)社会主义制度下要不要改革要不要继续解放生产力

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俄国十月革命后,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建立,在开始的几十年时间里,这些国家的生产力获得了较快发展,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强大生命力与勃勃生机,充分显示了革命对解放生产力的巨大作用。

但是,根据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不可能长时期与活跃的、经常变动的生产力相适应。一般说来,在历史的发展中总是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由此产生了同生产力状况不相适应的矛盾。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也有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通过何种方式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的重大课题。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完全适应,一笔勾销矛盾,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一些国家夸大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完全改变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更是错误的,实质

是背叛社会主义。

在我国的社会实践中,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开始认识是比较客观的。50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认真研究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作了新的概括。他指出,“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同时他又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①

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就要建立一套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组织形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众所周知,我国的体制是在建国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量照搬苏联经济体制的模式,结合原来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形成的管理经验和制度而建立起来的。主要包括:第一,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其特点是“一大二公”。第二,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中央通过指令性的计划形式来调节经济活动,各地区、各企业必须严格执行;财政统收统支,企业利润全部上缴;生产资料实行计划调拨,日用工业品统购包销。第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建立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7、771、776页。

集中管理的工资制度。这种重视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对重点建设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在当时是必要的,而且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确实起了很大作用。我国建国初期和“一五”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就是在这种体制下取得的。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规模不断扩大,这一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其弊端日益显现出来。对此,我国领导人已有所察觉,并从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试图按照我国的具体的情况,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在以后持续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党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和建设道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总的说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探索是不成功的。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存在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形成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固定观念,把建国初期形成的模式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把任何触动这种模式的改革都看成异端,把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正当措施统统当成资本主义加以抵制。结果,原有体制的弊端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严重。在经济体制方面,这些弊端表现为:经济决策和计划管理集权过多,统得太死,管得过细,企业缺少相对独立性和应有的自主权,完全按行政系统和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不重视经济规律、经济杠杆和经济立法的作用;财政上统收统支,分配上平均主义,企业和劳动者都不负经济责任,吃“大锅饭”;部门分割和地区分割,切断了经济发展的自然联系;流通环节多,渠道少,经营体制上统得多,包得广。所有这些,严重束缚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使社会主义经济失去了生机和活力,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因此,对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经济体制，势在必行。否则就不能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在南巡重要谈话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也是革命的命题，到邓小平同志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有了重大发展。

（三）改革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了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的大变革，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奠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这是对旧社会制度的一次彻底否定，从此结束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使中国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改革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改革的根本内容，是要革除社会主义社会中那些妨碍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具体制度、体制和管理形式，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体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40页。

制。所以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是一场较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本身更深刻、更广泛、意义更深远的革命。

第一,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所谓革命,就是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中所进行的重大变革,促使事物由旧质向新质的飞跃。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次革命,例如工业革命、产业革命、技术革命等等。而革命的最深刻的根源,都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人类一切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每一次革命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我们的改革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比如,以农村来说,从过去“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经过改革,废除了这种具体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经济体制来说,这确实是革命性变化,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第二,改革是一场广泛的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领导下,亿万农民率先冲破“左”的思想的束缚,改变旧的僵化的农村经济体制,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的改革,要在包括工业、商业、科技、教育等所有范围内全面配套进行。同时,这场改革不仅要在经济领域内进行,而且必然会深入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经济体制改革要在经济范围内,从生产到流通、消费、分配等各个经济环节中消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这是不言自明的。而经济体制改革必然会对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不适应新经济体制的部分提出新的要求,从而引发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深刻变革。例如在我国现行的管理体制中,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不下大决心搞机构改革,精兵简政,那么转变政府职能,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培育和发展市场

等,都有落空的危险,加快经济改革和发展经济就会困难重重。所以,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同时,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旧观念、旧习惯,也在改革之列。改革涉及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所以它是一场广泛的革命。

改革将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革除现有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弊端,建立起适合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从而必将调动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劳动热情,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已经深深地触动了体制,一些新的制度、形式、办法已经建立起来。相对于整个改革事业来说,我们还处在开始阶段,但已收到了迅速发展生产力的效果。可以预言,如果改革全面推行,进一步深入,并取得成功,改革的伟大意义和巨大的历史作用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四)正确对待改革也是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个命题

我们说改革是一场深刻、广泛、意义深远的革命,但这种革命决不等于在反动统治阶级还没有被推翻、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还没有被消灭之前的那种革命,不是什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即通常所说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改革是对体制的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力量,依靠亿万人民群众的自觉实践,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所以,决不允许以改革为名,制造任何过激行动和社会的政治动

荡。对这一点，我们党曾反复阐明，我们一定要在思想上把这个观点明确树立起来，并在行动上自觉遵守，决不能做任何有损于安定团结的事情。改革只有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如果社会动荡不安，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有人担心，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客观存在着不同利益的集团，它们在传统体制下的地位、利益及社会倾向不同，改革必然会引起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和摩擦，会不会因此而动摇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改革必然深刻触及旧体制的各种弊端，带来各种社会组织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但决不会由此而动摇社会主义制度。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的制度性质特征，与现实各种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不同。前者表明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本质属性；后者表明的，却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具体组织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体制改革要调整的是传统体制中各种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更臻于完善。因而，坚持改革将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而不是相反。当然，对那些带群众性的问题和直接涉及人们切身利益的问题，要格外慎重对待，要有充分准备，少说多做。由于体制改革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整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至今仍在探索 and 实践中，出现一些失误也在所难免。只要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和探索，这些失误是可以纠正的，它决不会动摇社会主义制度。

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史，就是改革史。如果没有改革，社会主义社会就会成为一潭死水，毫无生气。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

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今天,改革浪潮正在中华大地上汹涌澎湃,奔腾向前。一切立志改革的人,都要振奋精神,奋发图强,创新进取。我们相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的指引,有党中央制定的宏伟蓝图的鼓舞,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有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改革大业一定能够成功,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刘奎波)

九 要全面认识社会主义 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

在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争论最多的是所谓姓“资”姓“社”的问题。这个争论往往是从一些具体事物引起的，但这个争论所反映的问题，是很深刻的，实质上反映了应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南巡重要谈话中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谈到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时强调：“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进一步重视。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应该包括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这是当代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事实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有对立斗争的一面，又有相互学习、借鉴的一面。特别是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更要重视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好东西，才能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一）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对立的两种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有对立就有斗争，这种斗争是必然的。

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种剥削制度。列宁称之为“现

代奴隶制度。”它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现代这个矛盾仍然没有改变。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发达的商品货币关系，使生产越来越社会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发生很大变化，但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正是这个基本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社会主义制度以解放、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与目的，承认社会化大生产这种高度发达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否定其资本属性，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因而在根本上否定了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我们的理论：消灭私有制。《共产党宣言》讲的消灭私有制，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具体担当了否定、埋葬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而且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所决定，取资本主义而代之的必然是也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20世纪初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宣告了资本主义灭亡时代的开始，这个历史的长过程由此拉开了帷幕。

十月革命的胜利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的统治被震撼并发生动摇。当时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对年轻的苏维埃俄国纷纷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的政策，支持唆使白匪叛乱，直至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妄图以武力扑灭它，将其扼杀在摇篮中。这是两种制度的第一次较量，是社会主义诞生后与资本主义必然发生的尖锐对立和斗争。自此以后，两种制度的对立和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形式上不断有所变化，但从来没有停止过，有时还很激烈。如从4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的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就是这样，不过形式有所变化而已。70年代后，国际形势出现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

代的主题，两种制度从冷战共处变为和平共处。帝国主义国家就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扩大对外交流的机会，变换手法，大搞“和平演变。”美国政要直言不讳地说，他们从70年代起，眼睛就紧盯着匈牙利和波兰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了。显然，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是两种制度在新形势下继续对立和斗争的特殊形式。80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随后解体，资本主义暂时得手，社会主义受到重大挫折，两种制度的对立与斗争无疑还将继续。显然，只要这两种社会制度还同时存在，对立和斗争就不会消失，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人民就要保持应有的警惕性。但在看到对立和斗争一面的同时，也要充分看到对资本主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只看到前一面而看不到后一面是认识上的片面性，是一种“左”的倾向，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进步。今天对这个问题更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二)社会主义必须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好东西

这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与要求之一。学习借鉴什么？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今天由劳动人民世代代创造和形成的先进的科学与技术、有益的知识文化和经验以及科学的管理方法和经营方式。它们作为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并学习借鉴的东西。

社会主义必须从资本主义已取得的经验中，学习资本主义于我有益的一切，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在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全部生产力和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建设成功。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商

品经济比较发达。社会化大生产程度较高。创造出的一系列反映现代经济生活的过程与规律的文明成果,包括许多成熟经验与作法。显然,社会主义不能回避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基于资本主义对于封建主义的优越性就深刻指出,不向资本主义学习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

第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理所当然应该集人类文明史上一切优秀成果之大成。因此必须自觉地继承和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封建主义离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远,即便如此,我们都可以拿来封建时代的四大发明等优秀文化并引以自豪,为什么反倒要惧怕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和积累起来的人类文明成果?显然没有道理。资本主义国家不仅继承了封建时代形成的社会生产力和进步文化成果,如日本的现代企业管理就是这样,而且很注意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借鉴于它有用的东西,如加强社会保障,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与干预等。既然现代资本主义可以拿去社会主义的东西来延缓其衰落,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它的那些好东西,来壮大自己呢?社会主义必须善于学习,特别是善于向资本主义学习,自觉地壮大自己,才能在制度上优于资本主义,在生产力上高于资本主义,最终在生产方式即社会形态上完全代替资本主义。

第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属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社会主义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大胆吸收和借鉴。近两个半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创造并形成一整套高效灵活的经营管理方式,

特别是严格的现代科学管理以及最新科技成果的发明、大量新技术新工艺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资本主义在重质量、重效益、重管理、重视科技文化与教育、重视人才、保证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方面有许多深刻反映经济规律的成熟经验与作法。这些成熟经验与作法,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共同的要求和规律。我们学过来,有益无害。还应该看到,在人类发展到社会主义为止的历史上,唯有资本主义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方法并获得了按科学原则管理日益庞大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丰富经验。由此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必须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借鉴而别无选择。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如果缺少这个基础或不充分,就必须创立和发展这个基础。所以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的落后国家,在创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时,更要注意对资本主义的学习与借鉴,自觉地学习研究整个资本主义在发展商品经济、实现生产社会化和管理社会化大生产方面的经验,借鉴并采用资本主义广泛使用过的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要求与规律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而且要比资本主义运用得好,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迅速获得稳固的物质基础,更快更好地发展。

(三)与资本主义进行广泛合作,善于利用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新课题

与资本主义进行广泛合作,善于利用资本主义,是两种制度相互关系的又一个重要方面。现今人类面临许多共同问题,如能源、人口、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问题等。社会主义与全人类利益的一致性以及对全人类所负的使命,决定了她对人类共同关心,普

遍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熟视无睹。一球两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必须共同承担责任,积极合作,寻求解决的途径与方法。除此之外,在国际政治某些领域同样可以而且应该合作,如海湾危机就是这样。可以说当今世界,各种利益和矛盾相互交叉,错综复杂,人类在关系自己安全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有许多共同利益,需要两种制度的合作来维护。两种制度为解决涉及全球利益的问题进行广泛合作,是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过去不常有今天则大量存在的新现象。特别在经济方面这种合作显得更有必要、也更重要了。

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发展,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管理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许多文明成果。今天更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发生了不少新变化,拥有资本和科技优势、外贸优势、产业结构应变能力强的优势及劳动者素质较高的人才优势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与此有很大反差。经济建设中还有诸如资金短缺、人才匮乏和技术落后等许多困难亟待解决。比如资金短缺,我们急需大量国外资金,但今天国际资本越来越集中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对流,流向社会主义国家的直接投资很少,从而使资金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科技方面,经济竞争越来越体现为科技水平的竞争,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西方国家利用科技、教育优势和劳动者素质高的优势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或软化,生产普遍从劳动与资源密集型转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从而大大减少了对世界能源、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并凭借先进科技在对外贸易中占居明显优势。人们预计 90 年代发达国家在科技方面将有重大突破,对世界经济发展和各国综合国力的变化将产生重大影响。而我国由于科技落后及其它原因,影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并直接影响对外贸易,加之以往忽视教育,劳动者素质低,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越来越

越突出。显然,两种制度下经济发展的差距有拉大的趋势,社会主义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必须大大加快发展速度,发展慢了不行。最有效的途径与形式就是积极与资本主义合作,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用的东西。在这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努力与尝试,并取得很多成就与经验。如我们兴办“三资”企业,就是与资本主义合作,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资本主义的成功例子。虽然资本家要赚一些钱,但我们得到的好处更多,有些是钱买不来的,它有助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获得更广泛的国际市场信息,扩大我们的对外贸易等等。由此可见,对资本主义的合作与利用归根到底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

国际社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经济实力和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决定胜负的将是科学技术主要是现代高新技术。科技是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最有效的手段,依靠最新科学技术就能大大缩短我们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迅速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竞争能力。因此对资本主义的利用重点应放在先进科技方面。当然就合作与利用本身而言,可以有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如合作研究与开发、经济技术合作与引进人才、最新科技成果的有偿转让、资金方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借贷特别是长期低息贷款、发展补偿贸易、吸引并鼓励外商兴办独资或合资企业等,这些都是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形式的合作与利用。我们要通过这些形式和渠道,积极开展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资金、管理、人才等方面的广泛交流与互利合作,把资本主义的优势尽可能充分利用起来并变成我们自己的优势,学会以他人之长克己之短,才能“搭桥过河”,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

当代社会主义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加快发展。历史经验表明,不向资本主义学习借鉴不行;不善于同资本主义进行合作来发展社会主义更不行。这种合作利用是国际经济、政治发展

的新规律、新特点，也是社会主义自身发展规律愈益突出的要求。列宁曾提出过对资本主义合作、利用的思想，然而未及实践。因此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史上的新课题，它解决的如何，将影响未来社会主义的命运。

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一般讲不反映该制度的本质，不能将其与资本主义制度简单等同起来混为一谈。所以，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有用东西时，思想要更解放一些，胆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而不要被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与无理诘难所束缚。它们是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用，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用。不过，我们要以冷静的头脑和科学态度注意把握这样几条原则：一条是我们要大胆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好东西，同时必须坚决抵制各种腐朽的东西和反映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要准备“两手”，掌握“两点论”。另一条是一定要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把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有用的东西认真学过来，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加以运用、改进、提高，以创造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新东西。再一条是，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好的东西时，不能妄自菲薄，不能对社会主义事业缺乏信心。我们并非一切落后，如果因为要向外国学习，就变成盲目崇外，那同样是一种片面性。

当前两种社会制度在竞争中互相学习、合作和利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东西经过学习借鉴和改造利用，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历史和现实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陈富强)

十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和我们要建立的新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

从根本上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的经济体制。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最紧迫、最重大，事关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乃至整个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可以说，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和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都是为强调和解决这个问题而作的。

（一）尽快走出双重体制并存和对立的状态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 1978 年算起，已经经历了 14 年的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就着重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几年的城乡经济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全党动员，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为什么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建国 35 年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

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因此，“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①

经过 10 多年的改革，我们国家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但是，从改变旧的经济体制，建立新的经济体制的基本任务来看，我们的改革还远远没有“到位”，还必须继续深化和进一步加快。

因为直至现在，我国经济还处在从旧体制到新体制的转变过程中。我们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从放权让利，到利改税，再到承包制、租赁制等，取得了一定成效，又一一表现出局限性。这些改革，都是围绕利益机制进行的，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旧体制的弊端。当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从旧体制到新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个新旧体制并存的过渡时期。目前我国经济就处在这个过渡时期的中后期。一方面，旧的指令性经济体制已经在多方面被突破，原来用行政命令分钱、分物、分指标、分项目的中央计划机关不再能够令行禁止了，而新的经济体制却没有作为一个系统建立起来，特别是没有在我国经济骨干力量的国营经济中建立起来，这不能不造成资源配置机制的混乱，导致许多严重的消极后果，成为我国公共部门（包括国营企业和国家财政）陷于困境的主要根源。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证明，在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过渡过程中，双重体制并存的过渡时期不宜拖得过长，而要尽可能地缩短。否则由于国民经济中已搞活的

^①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 561—563。

“体制外”部分和仍在很大程度上受传统机制约束的“体制内”部分之间的摩擦，双重体制下存在的众多漏洞，经济不可能具有较高的效率。这种状况久拖不决，会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造成危害，即使出现了经济繁荣也难于长期保持。

所以，针对我国目前两种体制并存，在公共部门谁也不能有效地发挥配置资源的整体功能的状况下，我们应当争取尽快走出双重体制对峙的状态，把支持新经济系统运转的主要支柱建立起来。这已经成为摆脱困境，走向繁荣的当务之急。为此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目前，我们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

(二)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

这个从改革伊始就被我们千呼万唤的“新经济体制”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如何尽快地把新体制建立起来，这在今天仍是亟待经济理论工作者和改革实践的亿万参加者们，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一步研究、探索的课题。

从总体上说，我们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应当具备这样一些主要特征：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多种成分共同发展。第二，在分配制度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第三，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合理调节社会分配。

以这三条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体制，既保持了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又对旧体制和旧观念进行了重大改革。

首先,新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就从根本上把握和保证了我们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曾多次重申,“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① 这两条根本原则,从基本制度和根本目的两个方面,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指出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及一切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的本质区别。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基本因素,因此,无论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都不能改变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但“以公有制为主体”而不再追求“一大二公”,还要允许其他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不会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

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中如何分配,这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与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相区别的又一显著特征和标志。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②在资本主义社会,由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关系所决定,其分配方式必须主要是按资分配,结果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因此,一方面我国公有制占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另一方面,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指出的:“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怎样发展生产力,怎样改善人民生活,这个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页

之九十几的人的生活富裕问题。所以，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算不了什么，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也就是只有百分之几的人生活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还是贫困。但如果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处于小康状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道理。”这段话重心长的话语，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中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的现实意义和必要性。

“新经济体制”的“新”意，更多地体现在它的主要特征的新内容上。和旧体制的在所有制结构上追求纯而又纯、“一大二公”相对照，允许和鼓励在公有制占主体的基础上，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存在、共同发展，要算是新内容了，而从改革的过程看，这又是“老生常谈”了。现在作为新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来“谈”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现实意义。对那些担心中央政策说变就变的人们来说，这是一颗“定心丸”，大家可以放开手脚来干，而且作为新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理直气壮地干，再不是不知道何时将被铲除的“异己分子”了。关于政策不能变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谈话中强调指出，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另一个现实意义是针对另一些人的这样那样的担心的，也许不妨叫做“宽心丸”吧。邓小平同志在重要谈话中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

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新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之一，但如何实现这一目的，新、旧体制大相径庭。旧体制实际上把共同富裕等同于同步富裕。这样就好比一个人被捆住手脚，迈不开步子，只能笨拙地蹦跳，怎能快速前行，达到目标？所以我们在长时期里苦于迈不开奔向富裕之步，苦于找不到共同富裕之路，实际的结果只能是大家受穷。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构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说，一方面要放开手脚，允许一只脚迈到另一只脚前头，才能解决前进的问题；另一方面，前面的脚要带动后面的脚，形成你追我赶奔向富裕的景象。他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能够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并设想，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时，发达地区还要继续发展，但要通过多缴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的发展。

最后，“新经济体制”中最“新”的内容，也是新体制区别于旧体制的关键，在于它的第三个经济特征。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对这个重要问题的认识，我们党是在不断的挖掘旧体制的诸多弊端之根源的过程中；在总结这些

年来新旧体制并存、矛盾冲突的改革得失坎坷中；在比较和借鉴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经济的文明成果中，逐步明确起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高度发达不可逾越的阶段。而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必然离不开充分发育的完善的市场机制作用。那种认为市场作用多了，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耽心，是没有根据的和不正确的。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邓小平同志从 1979 年到最近的重要谈话中，多次强调过他的一贯思想，就是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是计划、市场这样的内容，社会主义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应该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为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起一个与之配套的、行之有效的经济体制或经济运行机制，这种宏观计划管理之下由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新经济体制，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夏爱平）

十一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南巡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同志这段话，为我们从理论上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打开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最近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要求我们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精神。他在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问题，把有关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大任务联系起来。因此，我们需要认真了解、研究关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问题，这同了解、研究关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问题同样重要。

（一）有计划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

江泽民同志在阐述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问题时，首先讲到托拉斯的作用。托拉斯所表现出的资本主义的计划性，说明有计划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时候，产品主要不是用于交换，生产者之间的联系是狭窄的、薄弱的。这个阶段的社会生产状况对于计划性没有迫切的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把商品经济推进到空前发达的阶段。伴随而来的是为追逐利润而展开的激烈竞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经济危机。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现实提出了计划性的要求。计划首

先出现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在资本主义生产集中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在一个部门或几个部门中居于垄断地位的大企业或企业联合,即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托拉斯比卡特尔和辛迪加更加稳定,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而从生产到销售全面合并组成的垄断联合。托拉斯的参加者在法律上和产销上都失去了独立性,由托拉斯董事会集中掌握全部业务和财务活动,原来的企业成为托拉斯的股东,按股权分配利润。在这样的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必须实行有计划的分工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必须协调配合,才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在企业外部,市场风云变幻、竞争激烈,企业需要及时了解外界经济情况及其变化,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作出相应的对策,才能在竞争中获胜。因此,严密的组织性和计划性,对于托拉斯来讲是必不可少的。自从产生托拉斯这样的垄断组织以后,再说资本主义就是无计划性,就很不确切了。

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指出,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出现,标志着生产的无计划性没有了。他要求我们注意恩格斯和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注意加强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变化情况的研究。恩格斯说:“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益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也没有了。”^① 列宁说:“关于资本主义的提法,不估计到托拉斯的作用,却说‘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无计划性’,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恩格斯指出:‘哪里有托拉斯,哪里就没有无计划性,而有资本主义。’……现在资本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

义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①由此可见，有计划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本质上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有计划或无计划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

（二）资本主义计划在宏观层次上的发展

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表明，不论在何种生产方式下，生产的各种要素之间，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以及生产的各个环节之间，都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而科学技术越进步，社会分工越细，生产社会化程度越高，这种比例性就愈益成为生产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社会生产的发展除了促使资本主义在企业内部实现组织性、计划性以外，还使得资产阶级不得不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许可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把生产力作为社会化的生产力来看待，对经济发展作宏观层次上的某些可能的、必要的计划调节，试图自觉地调整比例关系，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达到获取高额利润的目的。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本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除了各企业内部加强了计划性，在宏观层次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计划调节。二次大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和实施各种形式的宏观经济计划。因此，我们的思想不能停留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是无计划、无政府状态这类不确切的概念上了。因此，我们应该注意了解资本主义实行宏观计划的情况，以便更好地理解邓小平同志讲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以及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所指出的，不能把有计划只看成是社会主义独具的

^① 《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9页第436页。

特征。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职责是保障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正常运转。在经济领域中,让资本家各显身手,自由竞争。整个社会劳动、自然资源和资本的分配,由市场机制自发地调节。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日益暴露。其结果是经济危机反复出现,造成社会再生产过程经常中断,生产力遭到破坏,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已无力驾驭社会生产力,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19世纪最后30年间,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出现国有经济。首先是较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铁路等转化为国家财产,此外还将一些行将破产的工矿企业收归国有。国家开始成为资本的所有者。

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出现,国家成为资本的所有者,表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产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它不仅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深入到社会再生产过程内部,参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而且作为上层建筑,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为了对付1929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造成的困境,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上台后,开始实行国家全面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普遍采取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和措施。这可以说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实践中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凯恩斯的经济学说,认为单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难以避免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必须由国家干预调节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以扩大有效需求,使总需求与总供给达到均衡。这可以说是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相适应的理论体系。

一般地说,凡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都是对经济的

有计划的宏观控制与调节。这种宏观控制与调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一种经常的、稳定的机制。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不断加强,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加激化,经济危机频繁发生。战后爆发的5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表明私人垄断资本已经不能依靠自身力量来摆脱危机了,不得不求助于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一方面,面对无限扩大的生产与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日益紧张的市场问题,只有依靠掌握经济命脉和经济干预权力的国家,采取种种“反危机”手段,才能暂时渡过难关。另一方面,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巨大作用,使生产社会化达到空前的高度,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的经济交往和依赖关系更加密切。为了维持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的平衡,垄断资产阶级要求国家从宏观上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制定中长期计划,并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其他措施的全面调节,保证计划的贯彻,解决可能导致失调的各种矛盾。

第二,在现代社会,科研社会化的程度大大提高。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规模很大,需要巨额投资和复杂的组织协作,而且需要的时间长,风险也大。如果不是国家出面组织协调和投资,承担风险,仅仅依靠追求近期利益的单个垄断集团的力量,是不可能办到的。另外,科技进步和现代化生产的发展,对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发展教育事业需要投资多、周期长,这也是私人资本无力负担或不愿负担的。因此需要国家兴办公共教育,不断加强对教育事业的干预。例如,近年美国政府的教育拨款,一般都占教育经费总额的80%以上。

第三,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整个社会经济

环境的现代化。主要是：(1)尽快调整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2)及时更新和发展基础设施、公用生活设施；(3)治理公害。要解决这些问题，同样需要巨额投资，同样是建设周期长、利润率低。急功近利的私人资本不会愿意做这些事；而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更是私人资本根本做不到的。因此，解决社会经济环境现代化，也只能依靠国家的干预。

第四，战后生产和资本国际化进一步发展，各国垄断资本离不开国际分工、世界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际竞争异常激烈的条件下，垄断资产阶级需要国家加强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干预，出面进行国际协调。

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调节的形式，除了发展国有经济以增强国家干预的经济力量，通过财政政策调节，通过货币政策调节以外，还实行了“经济计划化”。“经济计划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已经开始出现，战后在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推行。“经济计划化”是国家通过制定、实施宏观计划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调节国民经济的一种综合形式。

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经济计划大体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短期行情计划，主要是针对当前经济变化趋势而制定的调节计划。主要内容是对一个年度的经济活动的主要指标，如经济增长速度、国民生产总值分配、国家投资增长速度等做预测性的规定。这些指标只作为各经济部门和经济单位的参考性指标。这种短期行情计划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例如在1973年，联邦德国规定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4.5%，但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这个指标可能会被大大突破时，政府很快采取了一系列避免行情“过热”的短期措施。最后，该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5.5%。

第二种是长期发展计划,有时为了区别于更长期的带有预测性的“远景规划”,也称之为中期计划。这类计划是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带有方向性或结构性的调节而制定的综合性计划,通常为期四、五年,有的稍短或更长些。“经济计划化”主要是指这类长期计划。这种长期计划是在对行情进行调研和预测的基础上,规定未来几年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向和主要指标,以及相应的具体政策措施。这里简要介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计划的情况。

法国自 1947 年以来制定和实施了 10 个发展计划。战后初期为了恢复和重建法国经济,第一个计划是集中力量优先发展煤炭、电力、钢铁、水泥、交通运输、农机、碳氢燃料和氮肥等 8 个基础部门,并在这些部门中实行了一个强制性的投资纲领——“基础纲领”。第二、三个计划的主要目标仍然是现代化和经济增长,同时强调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加强法国产品的竞争能力。在前三个计划期间,国家对主要部门特别是生产资料生产都规定了具体目标。从第四个计划开始,在把经济目标放在首位的同时,还考虑到社会问题,如就业、工资、住房、社会福利以及“合理分配”和地区差别,等等。长期计划的名称也由原来的“现代化与装备计划”改为“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

日本从 1955 年以来制定和实施了 9 个发展计划,如“经济自立五年计划”、“新长期经济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期经济计划”、“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等等。其中最著名、收效最显著的是池田内阁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 年度)。计划规定的目标是:极大地提高生活水准和实现充分就业,为此要求经济达到最大限度的稳定发展。在这一总目标下,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指标,如 10 年内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年平均为 7.2%,工矿业年增长率为 10.5%,物价

稳定,10年后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约增长一倍,等等。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计划还规定了5项中心课题:(1)充实社会资本;(2)引导产业结构现代化;(3)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合作;(4)提高人的工作能力和发展科学技术;(5)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实施“倍增计划”的成效比原计划还要好。日本经济的现代化主要是在“倍增计划”时期内实现的。

新加坡政府从1961年开始实行了两个五年计划和两个十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1961——1965年)重点放在发展替代进口,劳动密集的轻工业。为此而集中力量发展基础设施,为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条件。第二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重点放在以鼓励出口为目标的炼油、修造船、电子、电器等行业,同时扶持交通运输、贸易、旅游等行业的发展。第一个十年计划(1971——1980年)重点放在鼓励高技术、高增值,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较强的工业的发展。同时建立了亚洲美元市场,吸引亚太地区的游资。第二个十年计划(1981——1990年)重点继续放在知识密集型的工业方面,如电脑、机器人等,以逐步把新加坡建成中高级工艺制造、贸易、交通、通讯、电脑服务中心和超级金融市场。

另外,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国,包括第三世界的巴西、墨西哥等国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过一些计划化措施。美国政府的作法有所不同,更多地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实行间接的短期调节。

资本主义国家还采取种种措施,来影响资本主义企业的计划,尽可能地把个别企业的计划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主要办法有:(1)用增加或减少投资的办法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凡是国家规定的重点项目,国家优先提供大量投资。(2)用增加或减少税收的办法来影响企业计划,对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重部

门和企业采取税收优惠和加速折旧的政策。(3)国家和中央银行积极为计划项目筹措资金。对计划内的投资,国家还往往采取低利率的中长期贷款形式。(4)对计划内的项目,政府增加科研拨款,引进新工艺、新技术,使之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此外,国家还经常采用增加或减少订货、强迫企业合并及劳动工资政策等,来促进计划的实施。

应该看到资本主义计划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首先,国家从计划的目标出发,制定出对经济进行干预的长期设想和措施,并把它所拥有的经济杠杆统一组织起来,对经济的发展进行某种程度的自觉的调整,这就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盲目性。第二,由于实行计划化,国家不仅可以给国有企业下达指标,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内影响私人企业的计划,从而调节私人经济的发展方向。第三,国家的计划调节对合理利用资源,促进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影响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以及调整经济结构都起到一定作用。当然,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调节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调整,受到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制约。因此,它发生作用的范围和形式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启迪

研究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第一,资本主义有计划挽救不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但在个别企业内部实现了计划性,而且在宏观上也实现了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计划调节。资本主义从无计划到有计划,是它尚能维持生命力的原因之一。但是,

资本主义实行计划后并不能改变其所固有的本质,改变不了它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不能挽救其必然灭亡的命运。

第二,准确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醒我们需注意加强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变化情况的研究,以利于分清哪些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哪些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过去我们一直笼统地认为无计划性、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但只要不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只要认真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同样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已经实现了富有成效的计划调节,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列宁说:“早在 1891 年,即在 27 年前,当德国人通过爱尔福特纲领时,恩格斯就说过,不能象过去那样说资本主义就是无计划性。这种说法已经过时了。”^① 我们不应该受过时的认识的束缚,而应该解放思想,从研究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中得出新的结论。研究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不仅对认识当代资本主义,而且对认识社会主义都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进一步认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搞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经过 10 多年的改革,我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市场机制的作用有了比较切实的认识,对如何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正在进行探索。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和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都告诫我们,对计划与市场问题,不仅要从小社会主义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且要从资本主义的角度进行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实践都已证明,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它们既可以在私有制下发挥作用,也可以在公有制下发挥

^① 《列宁全集》第二版第 29 卷第 353 页。

作用。在资本主义国家,计划调节已经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在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验,这正是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可以借鉴的。在有关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我们既要认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又要正视无论在什么经济制度下的社会化大生产,都存在着一些客观的、共同的经济规律,破除陈腐的观念,这样才能建立起新的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充分显示出超越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殷 真)

十二 市场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

什么是市场？市场的作用是什么？很多人不大了解，过去关于市场的一些旧观念，还在束缚着人们的头脑，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阐明，市场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理解。

（一）市场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一说到市场，有些人往往把它同资本主义经济联系在一起，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市场的历史远比资本主义的历史长得多，古老得多。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从现在可以见到的文字记载来看，市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在我国最早的史书《易经》中，就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文字记载，形象地描绘了古代市场的交换情况。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那时市场的规模已相当可观，交易范围也相当广泛。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交换和市场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仅形成了遍及全国的国内市场，出现了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的名城重镇，以及买者卖者在街上摩肩接踵、挥汗如雨的商业兴旺景象，而且还出现了国际间的贸易，有了一定规模的世界性市场。比如，还在中世纪时，地中海沿岸一带的商业就具有世界贸易的性质，这是它产生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架起了沟通中国与西亚和欧·

洲的贸易联系桥梁。明成祖时代,郑和七下西洋,开辟了海上通道,发展了对外贸易。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情况来看,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国内外市场的扩大,特别是15世纪末新大陆的发现带来的海外市场的急剧扩张,大大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从而为资本主义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所以,不是有了资本主义才产生了市场,而是先有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才促进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形成,作为一个经济范畴,市场并非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不过,资本主义的产生,确实使市场有了一个超越过去任何时代的大发展。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先讨论一下产生市场的几个基本条件。第一个基本条件是剩余产品的出现,就是说,人们生产的东西除了供给自己吃用以外,还要有剩余,如果连自己的吃用都不能保证,用什么东西来进行交换呢?第二个基本条件是社会分工。人们所需用的东西绝大部分来自人们的生产,但如果大家都进行同一种生产,就没有交换的必要了。而社会分工的出现,使得不同行业 and 不同生产部门的生产者,分别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不同产品,你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你没有。如果我们彼此需要对方的产品,就要用自己的产品进行交换,于是商品交换和市场就应运而生了。第三个基本条件是对生产资料和产品不同占有。如果生产资料和产品属全社会所有,像经典作家们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那样,人们需要什么就可以领取什么,各生产组织和生产个人之间没有利益差别,那也不存在商品交换问题,市场也就无存在的必要。所以说,市场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内容。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商品生产,也就是通过市场而彼此联系起来的单独生产

者的生产”。^① 他还说,“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② 这里,列宁深刻地揭示了市场与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商品经济愈发达,市场发展的程度就愈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剩余产品大大增加;由于机器的应用和科技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新的产业部门,社会分工愈来愈细密;而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使得商品生产成为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这一切,是过去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商品生产所不能比拟的。自然,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的发展程度,也是过去的社会所无法想象和比拟的。

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市场成为配置社会资源唯一重要的方式和手段。市场把数以千万计的彼此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联系到一起,通过价格信号向商品生产者反馈着社会供求状况,引导着商品生产者的生产经营活动,调节着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同时,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促使生产要素自由地从一个部门流向另一个部门,自发地调剂着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余缺,从而使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合理的配置。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把市场的这种调节作用形象的称为“看不见的手”。从资本主义产生至本世纪30年代这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内,就是这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资本主义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通过对市场产生源头的追溯和发展过程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第一,市场的产生并不决定于所有制性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385页。

② 《列宁全集》第1卷第83页。

质,而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不能因为封建社会条件下存在过市场,就将市场看作具有封建性质的东西,也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推进了市场的发展,使市场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配置资源方式,就把它看作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第二,市场是与物质生产相联系,受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制约的客观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论在哪一种社会形态下,只要具有适宜市场存在的客观物质条件和经济条件,市场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本身内在的运行形式。市场的客观物质性决定了它具有内在的客观规律,这里既包括市场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也包括它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特殊的内部运动规律,人们只能逐步地通过实践认识和掌握这些规律,而不能仅凭主观意志来消灭这些规律。第三,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大大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已经成为无所不在、无处不有、无所不包的东西,人们的衣、食、住、行和一切经济活动,几乎都无法离开市场。商品经济越发达,市场作为配置资源手段的作用愈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分工越发展,商品经济越发达,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唯一方式就愈显出其局限性,愈需要与其他的配置资源方式相结合。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结合的方式将有所不同。

(二)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社会主义存在不存在市场呢?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情况来看,特别是从1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毫无疑问是肯定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着适宜市场

发展的客观物质条件和经济条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表明，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着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求发挥市场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商品生产和市场是鱼与水的关系，市场好比水，要养活更多、更大的鱼必须扩大水域。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不断扩大生产的经济，这种经济的充分发展，必然要求有不断扩大的市场，否则，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必然受到某种程度的阻滞。正如马克思所说：“产品的市场越大，产品就越能在更充分的意义上作为商品来生产。”^①他还指出：“对工业生产来说，市场的不断扩大则是它的生活条件。”^②不仅个别生产企业是如此，整个社会的生产也是如此，不断发展的生产，需要有不断扩大的市场。

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着商品经济和市场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得出的正确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重大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中，是不存在商品经济的，因而也不存在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完全采用计划的配置方式。马克思说过，在未来的新社会中，“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第2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第521页。

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③恩格斯也指出：“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上述设想，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资源的社会直接配置方式。这个方式有以下的特点：第一，由社会主义国家运用计划手段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第二，资源配置的原则是直接满足社会需要，不必通过商品交换关系，也不需“价值”插手其间；第三，社会对全部经济活动的调控，都由社会经济管理中心制定统一的计划来实现，计划是各微观生产单位进行资源组合所唯一依赖的信号。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社会主义的资源配置方式应该是高度集中的、唯一由计划机制发挥作用的直接配置方式。

从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来看，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初，所建立的都是上述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模式，我国也不例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不能说这种计划体制没有任何优点和好的作用，它在动员和集中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保证重点部门、重点地区和重点建设，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尽快建立起工业化体系方面，曾经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它的弊端也愈来愈显露出来，主要是在这种资源的配置方式下，企业失去了应有的经营自主权和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完全与市场脱钩，不仅不是根据市场需要来进行生产，而且也不知道自己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否为社会所需要，只是被动地完成国家下达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9页。

的指标任务,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

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也不存在市场。但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和贯彻他们的理论。我们只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从社会主义实践出发,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尽快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加快经济建设步伐。我们不仅不能否认市场的功能和作用,而且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把它看作是发展商品经济不可缺少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增添生机和活力。

(三)正确认识市场的功能和作用

作为发展商品经济的基础和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市场具有如下的功能和优点。

第一,联系和评判功能。产品转化为商品是通过市场交换实现的,市场把不同的商品生产者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重要手段。由于市场的存在,价值规律必然地会发生作用,个别生产者的劳动是否有用和有效,通过市场就可得到严格的检验和正确的评判,只有有用的、为社会承认的劳动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这样,在市场这位不徇私情的考官面前,企业只有努力增加生产,不断采用新技术,生产优质产品,改善经营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才能不致在竞争中被淘汰,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激励功能。在市场机制条件下,企业不再是国家机关的附属物,而拥有相对独立的经营自主权和收益分配权,企业生产完全受供求规律支配,竞争比较充分,企业盈亏的多少,取决于个别劳动消耗高于或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消耗的程度。这就必然刺激商品生产者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质量和效益,增强产

品竞争能力,极大地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产品更新换代的能力。其结果,必然促进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第三,调节功能。由于市场具有比较灵活的价格体系,通过市场价格的变动,可以灵活地调整市场供求关系,加之市场信息反映灵敏迅速,因而可以引导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行为,调节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比如,当某种商品生产过多,供过于求时,则价格下降,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者利润减少,于是便会自己主动缩减或退出对这种商品的生产。反之,若某种商品生产过少,供不应求时,则价格上升,生产者利润上升,于是便会增加对这种商品的生产。从整个社会看,社会供求一般会通过这种变动而达到局部平衡。

第四,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所谓优化资源配置,就是从资源的使用效率来看,应配置于能以最小的消耗获得大的产出效益的位置。在市场机制条件下,生产要素可以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自由地流入或流出,而且这种流动不是盲目的,而是受价格杠杆的调动和盈利的引导,一般来说是从利润率低的地方流向利润率高的地方。其结果不仅可以提高单位资源的使用效率,而且可以自发地调剂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生产要素的余缺,从而使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合理配置。

当然,市场的作用也不是万能的,也有其自身的明显弱点和局限性。比如,市场的自发调节所需时间较长,后果很不确定,不可能自动地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稳定和平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造成经济的不稳定;市场难以对相当一部分公共设施和消费进行调节,在某些社会效益重于经济效益的环节,市场调节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社会目标;在一些垄断性行业、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市场调节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市场调节还容易造成收入分配上的过分悬殊,从而形成两极分化等等。

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市场具有这些缺陷和不足,就弃之不用。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过程中,是须臾不能离开市场的,必须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市场为中心组织社会主义经济,使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生产要市场而生产,分配要依靠市场来实现,消费要依靠市场来满足,并以市场作为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把社会范围内的各种经济活动主体组织到社会化大生产中来,通过竞争和价格杠杆把稀缺资源配置到能创造最好效益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带来压力和动力,有效地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必须发挥计划调节的作用。事实上,现在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也受计划的调控。我们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进一步调整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使计划和市场二者更好的结合起来,建立起适应我国国情的优势互补的资源配置方式,使我国国民经济得以迅速而健康地发展。

(陈高桐)

十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发展过程

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回顾这个过程,有助于我们从传统的、僵化的思想理论观点中解放出来,正确地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坚定地把经济体制改革推向前进。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对这个问题的普遍认识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人们对计划与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普遍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的教条式理解上,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认识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后,就不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列宁则说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斯大林虽然承认了商品生产,但仅限于农产品和个人消费品,而否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不允许生产资料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交换。斯大林还把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当成法律。我们把这些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的标准模式,形成了一种固有的观念,社会主义可以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不能叫商品经济;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只是保留着商品的外壳;社会主义必须是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在那时,十分重视商品流通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的经济学家也认为:社

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就在于以计划代替市场。可见,把计划与市场作为区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影响多么深。这些理论观点,是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得以建立的基础。这种体制又强化了人们的这些理论观点。

由于这种理论观点和管理体制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弊端甚多。诸如: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等等,挫伤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在这种体制下,党和国家尽管一再想加快发展生产力,即使在“文革”期间也还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但由于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失误,就不可避免地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挫折。生产力发展不快,经济效益很差,商品匮乏,年复一年地重演“工业报喜,商业报忧,财政虚收”的现象,经济运行无法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这种状况,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

(二)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是实践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为什么按这种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弊端如此之多,又如此之严重?这些问题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所有按这种模式搞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重新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摆脱传统理论观点的束缚,探索新的理论观点创造了条件,人们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逐渐有了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提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时说: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但也有不同。这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① 可惜,这个讲话多年来一直没有公开发表,鲜为人知。

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把“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新道路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前后,理论界有人主张把计划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作为改革的方向。1980年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吸收了这一意见,并请各省市第一书记讨论。虽然受到若干人的赞扬,可是由于问题复杂,中央未作结论。但在实践中,国务院十分重视市场的作用,逐步放开若干小商品的价格,对计划外的生产资料准许议购议销。事实上,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成分已在不断扩大。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① 转引自1992年4月16—19日上海《解放日报》龚育之的文章:《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经济除计划经济外,还应当有市场调节,提出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2年11月,国务院在《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再次强调:“必须正确贯彻执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把大的方面用计划管住,小的方面放开,主要通过工商管理管理和运用经济杠杆加以制约。”“无论实行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要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这一提法,对于突破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推动市场的发育,重视发挥市场的作用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在1982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有的经济学家开始从使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概念,发展到使用“商品经济”的概念,著书立说论述商品经济理论,主张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然而有些同志对此提出异议,这些同志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和政策上,他们对“商品经济论”和“有计划商品经济论”进行批评,认为社会主义最多只能是“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而决不是商品经济。还认为,使用“商品经济”这个概念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会损害社会主义。讨论的结果是后一种主张占了上风,一时间,“商品经济”这个概念的使用,几乎成了禁区。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决定》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突破了把计划经

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表明,认识到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这比“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它从根本上否定了把商品货币关系看成异己力量的传统观点,作出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选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辟了新的道路。这个决定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肯定和支持。他在通过这个决定的会上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政治经济学。^①随即在中顾委全会上说:“这次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解放思想,我们老同志有这个任务。”^②从这以后,“商品经济”这个概念才不再成为禁区,而被普遍接受和运用了。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回答美国企业家代表团团长格隆瓦尔德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的提问时说:“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这当然是一种好办法,但多年的经验表明,光用这个办法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应该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

① 转引自1992年4月16—19日上海《解放日报》龚育之的文章:《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

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78页。

来,这样就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速生产力的发展。”^③这是明确用生产力标准来观察、评价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并且批评了过去光用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这个问题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可惜,这个讲话也未公开发表。

(四)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新体制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在这个问题上又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十三大报告提出: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这表明,要把计划工作从产品经济基础上转到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来。既然是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必然有商品交换,也就必然有市场。这里已经提到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形式和手段的问题。这是我们党摆脱过去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束缚,取得的重要认识成果。

当然,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太深,有些同志一时还难以摆脱

^③ 转引自1992年4月16日—19日上海《解放日报》龚育之的文章。

传统观念的束缚，仍然把计划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所特有的，认为“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市场取向等于资本主义取向”。这些观点，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

面对这种情况，1989年6月，邓小平同志重申了十三大的观点，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①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五）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990年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市场。”^②

1991年3月2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皇甫平题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的文章，从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分析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文章写道：“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

^① 《邓小平同志论改革开放》第125页。

^② 转引自《改革》杂志1992年第3期第37页。

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邓小平同志的观点。他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公有为基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两者存在本质区别。计划与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

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又一次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就标志着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成熟了。它把人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从传统的旧观念中解放了出来。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就改变了视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传统观点；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就把市场经济等同资本主义的观点否定了。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说明无论是计划或是市场，都是在社会化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方式、经济运行方式，并不具有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性的区别。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用。在现代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中，有两个规律发生作用：一是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作用。所谓市场调节，无非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反映；而计划调节不过是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反映。这两种调节手段，都共存于商品经济之中，都是发展商品经济不可缺少的。

(六)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现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呢?经过长期的讨论和人们认识的深入,在明确了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手段之后,对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作出了回答。许多理论家和学者都认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回事。首先,商品本来就是为市场而生产,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产品。有商品生产,就有商品交换;有商品交换就有市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一定要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区别开来,是自相矛盾的。其次,既然已经明确,计划和市场都不是区分社会制度的标志,只不过是调节经济的方式和手段。区分社会制度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发展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其地位、作用、性质都不同。因此,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不致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混淆,那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也就用不着忌讳。

对计划与市场及其关系的认识过程,是不断克服落后的、僵化的理论观点,不断使认识符合客观实际、解放思想的过程。能够有今天的认识,来之不易。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特别是对一些重要问题,总是要经过反复认识,反复讨论,并通过实践不断总结提高,才能得到比较科学的认识。现在可以这样讲,经过十多年的摸索和总结国内外经验,我们对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在理论上实践上的认识,已经比较成熟了。”

(刘 鹏)

十四 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的九个重要问题之一加以阐述,从而突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一) 加快改革包括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仅从字面上看,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没有特别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但从精神实质上看,他的谈话是包含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因为他讲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全面改革当然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这是他的一贯思想。1986年6月,他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①同年6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改革政治体制,增强法制观念》中又一次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②他在南巡谈话中讲到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实际上也是指“遇到人的障碍”。所以要想改革开放迈开步子,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必然的逻辑。江泽民同志正是把握住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33页。

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37页。

了这个精神，所以专门讲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说：“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是对存在弊端的原有体制的革命，目的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增强生机和活力。我们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走西方民主政治的道路。它所遵循的方向和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①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有充分根据的，是完全正确的。

第一，这是由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的本质和政治体制改革自身的性质决定的。

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其政治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制度，对人民的敌人来说意味着专政，而对人民自己来说则意味着民主。邓小平同志说：“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② 我国的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是说，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本质。要从政治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根本的就是要使人民民主得到充分实现，得到

① 《人民日报》1992年6月15日第一版。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4页。

不断发展。就是要确保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像江泽民同志所说的那样,“是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而不是走西方民主政治的道路。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那末,它应沿着什么方向去完善、去发展呢?显然,只能沿着民主化的方向,不断扩大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须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是密切联系、互相制约的。一方面,“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① 所以,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理所当然地就是要兴利除弊,使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日益完善,使它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政治体制,主要应当努力实现这样的要求:“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② 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一文中,邓小平同志讲得更加明确:“我们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要坚定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③

第二,这是由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原有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的实际决定的。

中国是世界上封建主义历史最长的东方大国,在这样的国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4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82页。

③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32页。

度里建设社会主义,会遇到别的国家所遇不到的特殊困难。“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①现在,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特别是民主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还存在种种弊端,这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正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②这种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必然会程度不同地反映到政治体制中来。

我国原有政治体制中的弊端主要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官僚主义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干部搞特权、特殊化现象;机构臃肿重叠、人浮于事现象;法制、规章制度不健全现象;压制民主、压制人才的现象;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的现象以及领导人凭经验拍脑袋决策的现象,等等。邓小平同志说:“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③封建主义与民主是水火不相容的。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必须革除这些弊端并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同样,要革除这些弊端并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同志说:“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2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5页。

③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6页。

促进现代化事业的顺利发展。”^④

第三，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正确主张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说：“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邓小平同志也指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⑤ 在《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一文中，邓小平同志又指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⑥ 总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党的不少重要文献都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今天，江泽民同志再次重申这一方向和目标，正是为了要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得更快、更好。

第四，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和根本措施。

邓小平同志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关于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的问题时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

④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6页。

⑤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页。

⑥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4页。

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①

由邓小平同志的这个回答，我们联想到了毛泽东同志回答黄炎培先生关于共产党怎样才能跳出“周期率”的问题。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节录了黄炎培《延安归来》一文中的一大段话：“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不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07页。

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有效的。”

在节录上述一段文字后，薄一波同志说：“历史的客观进程，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开拓‘民主新路’，打破‘这周期率’，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① 薄一波同志的这个看法是很正确的。只有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在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切实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好，我们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祖国的长治久安。

（三）必须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离的，为了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必须使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制度化和法律化。这也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早在1978年，他就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② 在谈到克服特权现象时，邓小平同志指出：“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允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

①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57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6页。

都不能逍遥法外。谁也不能违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也不允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允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只有真正坚决地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①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论述虽然是针对克服特权现象而讲的。但对于民主和法制的统一性,民主制度化的重要性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党的十三大报告也着重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不可分割的原则。报告认为,没有全社会的安定团结,经济建设搞不成,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搞不成。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主和专政的各个环节,都应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在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其中尤以立法方面的成就最为显著。我们不但完成了修宪工作,制定了新宪法,而且初步形成了以根本大法宪法为核心和基础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可以说,我们已经基本上达到了“有法可依”。今后,在立法方面的任务,主要是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和同各方面改革相适应、相配套的问题。

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固然同公民的法律意识不强有关,但更根本的还是我们的政法管理体制及司法监督体制尚未完全理顺和尚不完善造成的。所以,我们应从两个方面加紧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92页。

努力：一方面要进一步做好普法工作，继续加强对公民的法制教育；另一方面则要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以便进一步理顺和完善政法管理体制及司法监督体制。令人高兴的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来，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以及有关职能部门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且已经或正在采取相应的措施。可以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真抓实干，这些问题是一定能够解决的。

（董新民）

十五 坚持“两手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坚持“两手抓”，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并举、缺一不可。这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再次阐述了这一问题。

（一）坚持“两手抓”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要求

坚持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这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早在1940年，毛泽东同志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新中国要有新的政治、新的经济和新的文化。“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实践中，我们既抓了经济建设，也抓了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建设新国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发生了许多问题，出现了很大的曲折，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曲折。这反映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不深刻、不全面、不完全清醒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果断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使我们对这一问题逐步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

1979年，叶剑英同志在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

出：我们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限于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方面，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列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要点之一。在十二大报告中，作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科学论断。党的基本路线规定，要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目标实际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要求。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新中国要有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最近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又指出，建设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论断都突出阐明了坚持“两手抓”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表明坚持“两手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从这样的高度来理解问题，自觉坚持“两手抓”。

（二）坚持“两手抓”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

坚持“两手抓”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他对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的“两手抓”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项基本原则。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邓小平同志一向坚持改革开放，同时，他又反复强调，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他认为：“现在我

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①“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②他还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我们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③1989年,邓小平同志再次提出:“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是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④

第二,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⑤“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98—99页。

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7页。

③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26页。

④ 《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180页。

⑤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0页。

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① 建设两个文明,是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发展。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保证。因为两个文明有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实践中,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也是重要的领导艺术。

第三,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

1982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② 1986年,邓小平同志又提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③ “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④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指出:“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6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59页。

③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30页。

④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31页。

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①在今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再一次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②

总之,邓小平同志关于“两手抓”的思想内容是很丰富的。他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有过不同论述。他的“两手抓”思想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他把“两手抓”看作是两点论,将其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二是,他强调两只手都要硬,而不能一手硬,一手软。把握这两个特点,将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邓小平同志的“两手抓”思想,而且,对于我们的实际工作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在新形势下必须坚持“两手抓”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再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两手抓”,并使之成为“我们领导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and 领导方法、领导艺术。”在新形势下坚持“两手抓”,尤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抓好教育、科学、文化的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在当代,教育、科技的发展,劳动者文化素质的提高,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这些年来,我们在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劳动者

① 《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181页。

② 《人民日报》1992年3月31日第4版。

素质低下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我国现有文盲 1.8 亿,每年还有 200 万新文盲产生。在我国总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 1.4%,受过中等教育的只占 8%,受过初等教育的也只占 17.9%,受过小学教育的占 37.1%。落后的文化教育事业和低下的劳动者素质,已经日益成为我国经济起飞的重大障碍。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当前经济要加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在努力抓好经济工作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抓好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努力减少并杜绝埋头抓经济、无视科技教育、有钱盲目投资设厂、无钱办教育等种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的现象。

第二,抓好思想道德建设,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人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两方面的内容,而其中,思想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灵魂,规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毋庸讳言,我们的思想道德建设现在正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比如: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生提出的是“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响亮口号,到了八十年代末,在一部分大学毕业生中,却流行着“到外资企业去、到国外去、到挣钱最多的地方去”的说法。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分青年人的崇高理想的泯灭和价值观的蜕变。造成一部分人思想道德滑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改革开放以后从境外传入的一些腐朽的东西防范不够,措施不力,这方面的教训我们应该记取。众所周知,人才,已经成为当今国际高科技竞争的核心,据有关材料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将面临着人才短缺局面。另据报载,为了弥补人才的短缺,日、美、韩三国已瞄准了中国大陆的科技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只注意了对人们进行文化科学知识的教育,而忽视了对其进行思想道德的培养,那么,当“是效力于

异邦、还是服务于祖国”，“是为个人享受而索取，还是为整体利益而牺牲”这类问题摆在面前时，我们就很难指望有些人能有一个正确选择。将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的人，是不会与祖国共命运的。实现“四化”，需要有“四有”人才。所以我们在抓经济建设、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要把对人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同进行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优良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有机地结合和统一起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大批合格人才。

第三，抓好廉政建设，努力铲除党内腐败现象。中国共产党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又是这一建设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所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我党是否能有一个好的党风。当前，党的主流是好的，广大党员干部是廉洁奉公的。但是，也确实有一部分人经受不住新形势的考验和金钱的诱惑，蜕化变质。他们人数虽少，但危害极大，他们不仅败坏了党风，毒化了社会风气，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引起了人民强烈不满。端正党内、铲除党内腐败现象，已经刻不容缓了。早在1985年，邓小平同志就曾经指出：“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① 在最近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又再一次重申，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我们要充分认识抓好党风、惩治腐败的重要性，把这项工作坚决而又持久地进行下去。

第四，坚决有效地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

① 《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256—266页。

良好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社会治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卖淫、嫖娼、吸毒等在建国后早已绝迹了的丑恶现象再次沉渣泛起,黄色书刊、音像制品一度泛滥,经济犯罪、刑事犯罪方面的大案要案呈上升趋势,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犯罪团伙。社会主义追求的是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它决不允许这些丑恶现象存在下去;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对各种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分子必须坚决予以打击。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说:“广东要力争 20 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这段话意味深长。虽然是对广东讲的,但全国各地都应这样做。我们应该充分运用专政的力量,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消除各种丑恶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梁丽萍)

十六 解放思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精神

贯穿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思想更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办法更多一些，步子迈得更大一些。在这里，首先是解放思想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进一步阐述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并针对当前情况，提出了长期坚持解放思想的要求。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

解放思想，是贯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基本精神，也是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全会的一个主要特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一个长期有效的重要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过去了将过14个年头，但今天回过头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的口号，其意义（历史的和现实的）更明显了。

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的讲话中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当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33页。

论,认为这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并指出,这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要不要解放思想还要进行争论;另一个是这个争论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问题。今天回顾一下这段历史,还能得到很好的教益。

从50年代开始,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逐渐出现了领袖人物作不科学评价的现象,而且,日益加码,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到了迷信盛行,教条主义严重禁锢人们思想的地步。一切按“最高指示”办,人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不必从实际出发,绝对按本本办,如果与实际情况不符,也要让实际服从本本。

在迷信和教条的统治下,明摆着是不符合实际的决策,也要坚决地硬性地贯彻执行;明明是好干部,也要按照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当作阶级敌人打,而且“永世不得翻身”;已经造成了天下大乱的文化革命,还要七、八年再来一次。这是何等的愚昧!在那样的环境中,谁也不能独立思考,确实也使广大的人们懒于独立思考,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做任何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谁要是越过了这个限度和界限,就要被认为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甚至被认定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上述这样一种局面,造成了种种严重的恶果,集中起来讲,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20年的滞缓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停滞倒退(与亚洲“四小龙”比,与世界其他发展快的国家比,确是如此)。如果我们的国家继续这样下去,只会越来越落后,在国际上还有我们的地位吗?如果人民生活的温饱问题长期不能解决,陷于贫困状态,社会主义制度能巩固吗?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还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吗?“就要亡党亡国”,这话一点没

有夸张的成份。这种危险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的。

可是，处在迷信状态下的人们，对此却是麻木不仁，甚至自我感觉良好。而在迷信和教条主义哺育下生长起来的某些领导人，则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来维持这种局面。他们的原则是：过去的一切不许变动，今后的实践按既定的一套办。他们的规范语言就是“两个凡是”。

历史在呼唤，人民在觉醒。一个要求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愿望以各种不同方式，日益强烈地反映出来。历史巨人的前进步伐是不可阻挡的，但他要突破一个卡口。这个卡口就是“两个凡是”。最终，人们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两个凡是”，还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争论的主题从表面上看，就是这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武器简明、有力，一下就把“两个凡是”这个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左”的卡口打开了，冲垮了，于是，就有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有了平反冤假错案，就有了全面拨乱反正，就有了改革、开放、搞活，就有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整个国家出现了转机，很快就出现了生机勃勃、快速发展的生动局面。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不解放思想，我们不可能顺利地进行拨乱反正，就不可能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也就不可能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路线，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精神，也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

(二)解放思想的方针和原则精神必须长期坚持

邓小平同志在 1978 年就说：“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①就是说，从上到下，每一级、每一个单位，都要坚持解放思想。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指出：“思想解放了，脑筋活了，想问题的面就宽了，无论是发现和选拔人才，无论是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和障碍，无论是开拓新的领域和新的事业，办法就会更多，路子会更广阔。”^②这是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并针对当前情况而讲的。

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要不断解放思想？大家都可以举出有很多切身感受的事例来加以说明。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这个问题，需要讲一些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基本原理上来加深理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他们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则明确指出，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后，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这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只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也不可能为各国实践社会主义提供具体的实施方案，社会主义者不应当教条式地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要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 133 页。

② 《人民日报》1992 年 6 月 15 日。

也应当这样。

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后，又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切合中国实际，而不应去死抠“特色”二字，不应抽象地定义式地去抠什么是“中国特色”。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此需要明确以下几点：

(1)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模式，别国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应当借鉴，但不能照搬，基点是要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进行探索、试验，发挥创造性，开拓前进。因此，思想上既不能教条式地理解社会主义原理，也不应有任何固定框框，而是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要反对任何思想僵化。

(2)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没有固定的模式。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一些制度、一些方针政策、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具体情况下，是适用的有效的，过了若干时间，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社会向前发展了，条件改变了，就要加以发展、调整、补充或改变。这就不能固守原有的那一套，思想要跳出原有的框子。就是说，要不断地解放思想。我们要善于掌握稳定性与变动性的辩证关系。

(3)中国特色要与地方特点相结合。对于某一个局部地区来说，“中国特色”也是一个一般性的概念，因此，不能照搬全国性的一些东西，也不能照搬其他地区的做法。对于每一个局部地区来说，要认真研究本地区的地方特点，从本地实际出发建设社会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2页。

主义,走出自己的路子,形成自己的特点。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目前,已有若干地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艰苦探索,大胆试验,找到了自己的发展路子,已经形成或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凡是经济发展得比较快的地区,几乎都是这样。但是,从全国来说,盲目追求某种模式的现象还存在,有些人不是自己解放思想,从本地实际出发,发挥创造性,而是热衷于参观考察,到别地别单位参观取经。珠江三角洲的东莞、顺德、南海、中山,被称作“四小虎”,这些地区从自己的特点出发,经济搞得多姿多彩。现在,珠江三角洲的市县经济已经逐步形成了因地制宜、扬长避短、自成一格的新格局,其中的奥妙就是他们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当前一个时期,由于要根本改变旧的经济体制,要进一步打破多年形成的封闭状态,进一步改变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和半产品经济,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加快经济的发展,所以,特别要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换脑筋。

(三)怎样进一步解放思想

江泽民同志说:“所谓解放思想,就是勇于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善于从实际出发,努力去开拓进取。”^①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也是实事求是。但是,如果思想受到束缚,有了框框,就难以做到实事求是。思想上为什么会有框框呢?这种框框可能是由于某种政治压力,可能是由于某种盲目性(如

^① 《人民日报》1992年6月15日。

个人迷信),或者是由于习惯,等等。但是,为了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各种思想框框都要打破,这就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联系,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另一方面,解放思想是为了实事求是,因此,不能把解放思想理解为无根据地瞎说蛮干。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思想不解放的情况,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时相比,情况已有很大差别。在我们的社会中,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还存在。“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①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某些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一些人,生活稍有改善便感到满足,所谓“小富即安”。还有的人,搞了一点小的事业,取得了一些成绩,就很自满,不知道天外有天,或不想与天外天比高低。因此,摆脱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束缚,仍是解放思想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在当前和今后的长时期中,都是这样。

从指导思想来说,解放思想主要是要冲破“左”的禁锢和束缚。

邓小平同志说:“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②“左”存在多年,又波及全国,已经形成了习惯。这种习惯,形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式,成了思维的习惯。这就增加了纠正它的难度。这几年的情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中要开辟新的道路,采取一些新的办法,如实行股份制、股票、保税区、出租土地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32页。

②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第28页。

给外商等等，“左”的东西就冒出来反对，成为阻力。要改变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原有模式和做法时，也是这样。姓“资”姓“社”的问题就是在争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出现的。

解放思想还要开动脑筋。这也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他提出：“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① 他还说：“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我们的思想懒汉不少，讲现话、空话的多。真正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样的同志还不多。”^② 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开动脑筋，不断地找新思路、新办法，这确是使思想不断解放，开拓前进的一个重要问题。

总之，一个是摆脱“左”的禁锢与束缚，特别是不要怕那些政治家、理论家的大帽子，坚持以生产力标准来衡量；另一个是开动脑筋，多想办法。有了这两条，我们的思想就能不断得到解放。

（沈宝祥）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33—134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43—244页。

十七 “左”和右的主要表现 及其思想认识根源

在党的历史上,党的正确路线常常会受到“左”和右的干扰。在历史新时期,实行改革开放,这是一项全新的政策,又极其复杂,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干扰。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他明确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大家从这几年的切身感受中认识到,邓小平同志的论断不仅符合实际,而且击中要害。

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左”和右究竟有哪些具体表现?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对现实生活中“左”和右的具体表现作了分析,从而回答了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怎样理解“左”和右

要搞清楚“左”和右的具体表现,首先要明确“左”和右的含义,也就是什么是“左”,什么叫右。关于这个问题,过去似乎有了定论,毛泽东同志就讲过几次。我们在理解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所说的“左”和右,通常是指共产党内部偏离正确路线的倾向,是党内的概念。翻开共产党的文献和领导人的著作,“左”和右,或“左”倾右倾,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举一个例子。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诞生前召开的党的七届二次会议

的报告，是一篇很有名的纲领性文献。这一文献的第六部分讲新中国经济情况，一共讲了七条，从第一到第四，每一条的结尾，都是落到“左”和右的问题上，不这样做，“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或“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里讲的右倾或“左”倾都是指党内偏离正确路线的倾向。

但是，在党处于执政地位后，情况就有所不同。尤其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组织遍布全国各单位，5000多万党员分布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党内的倾向性问题往往同党外、同社会上的某种思潮相联系、相结合、相互影响。往往是先由社会影响到党内，而党内的错误倾向又对社会的错误思潮推波助澜。1989年的政治风波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情况。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侵入党内，一些站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边的共产党员又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相结合，甚至成为骨干，成为头面人物。总的情况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左”和右的情况比过去复杂多了。

其次，关于“左”和右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多次作过界定。他在195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① 根据这个界定和过去习惯的理解，“左”和右的第一层意思是：超越时代、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超越群众觉悟程度和实际可能，去定目标，提要求，蛮干，这是“左”，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左”倾冒进；落后于时代、落后于当前形势、落后于群众，目标太低，干劲不足，这是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右倾保守。“左”和右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2页。

第二层含义是，在阶级斗争和各种政治活动中，混淆敌我，乱扣帽子，乱批乱斗，搞过火斗争，这是“左”；在阶级斗争问题和政治问题上，惧怕敌人，缺乏应有的警惕和斗争性，不敢斗争，放弃原则，这是右。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在此之前的长时间中，我们党内的错误倾向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过去的“左”，上述两层含义的“左”都有，既有在经济建设上超越客观实际可能的急躁冒进的“左”，超越发展阶级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左”，更有混淆敌我矛盾，无限上纲，乱批乱斗的“左”。经过拨乱反正，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上超越阶段的“左”得到了克服，在某些时候的经济过热，构不成“左”倾错误。但过去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在政治生活中的“左”的影响，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并时时影响着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而具体情况又相当复杂。

（二）当前“左”和右的表现

“左”的表现主要是什么？

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在反倾向问题上明确提出主要是反对“左”。他的谈话，通篇贯串了反“左”，而“左”的思想又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上，他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个不同意见，主要就是“左”的思想观点、主张。邓小平同志对于“左”的表现着重指出了两点。这就是：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大家觉得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左”的主要表现，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但是，不少人也希望能更具体地理解这个问题。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对此作了具体的说明。

江泽民同志说：“现实生活表明，“左”的表现主要是停留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改革开放前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和政策上，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因此不容易接受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甚至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认为搞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仍用过去那种“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来影响以至冲击经济建设为中心。”^① 多年的“左”反映在一系列问题上，有理论，有观点，而且形成了习惯势力。下面列举一些：

在消灭私有制和消灭阶级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他们的理论，就是“消灭私有制”。列宁也多次讲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每一个国家如何实现这些原理，要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经过很长的发展过程。这一点《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篇序言就明确地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我国的经济文化很落后，生产力很不发达，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显然，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完全地彻底地实现上述原理的。只能基本上实践这些原理。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比如说，达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甚至还要高得多，才能彻底消灭私有制，彻底消灭剥削。但是，我们过去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一个初级阶段，而急于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把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几乎百分之百地改造了，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在方针政

^① 《人民日报》1992年6月15日。

策上,表现了明显的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左”的倾向。

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上,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在消灭了私有制以后,商品就不存在了,货币也不必要了,价值规律也失去作用了。以后,斯大林又在他的《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有商品生产,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中虽然还起作用,但其作用要受到严格的限制。我们长期教条式地理解这些原理和观点。没有从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甚至忌用“商品经济”这样的提法和概念。其结果是,大大限制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左”的思想观点和做法。

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恩格斯曾针对资本主义前期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指出社会主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后,可以按照计划进行生产。列宁则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可以像一架机器那样,严格地加以控制,有条不紊地运转。我们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有两个偏差,一是认为社会主义应搞高度集中统一、无所不包的计划,否认和排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重要作用,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二是认为,计划就是指令性计划,忽视了或不懂得搞指导性计划,结果是把经济管得很死,很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来是讲得比较全面的。他们揭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指出了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但是,他们又指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必然要吸收人类历史上包括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讲得很彻底。恩格斯在讲到古代奴隶制的历史地位时说:“只有奴隶制才

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和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① 恩格斯是从文化的角度讲古代奴隶制与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的关系的,没有突出讲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社会主义的关系,但是,这已是不言而喻的问题了。可以说,在文化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更加密切和多方面的。不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地方对此都作过论述。列宁则有一句名言:“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②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明确提出要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要依靠资产阶级专家。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原理和政策。可是,长期以来,我们片面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和进行斗争的一面,而且以为很快就能使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绝种,没有充分重视借鉴吸收资本主义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不懂得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更没有同资本主义国家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的思想。盲目地、不加分析地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是长期以来“左”的主要表现。

对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很长时期中判断不符合实际。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

般说来,无产阶级在建立了政权,消灭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和其他私有制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以后,就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段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无产阶级在剥夺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以后,就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因为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存在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剥削制度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我们党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1956年,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对国内基本情况作了符合实际的分析和判断,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经济文化落后与人民要求迅速发展经济文化的矛盾,今后应集中力量搞技术革命,发展生产力。但是,由于国内政治生活中发生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情况,再加上国际上西方借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而掀起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对这种形势我们没有能作冷静的估量,夸大了阶级斗争的比重,在195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否定了八大对于国内主要矛盾的符合实际的判断而武断地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得到1958年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的肯定。从此,便以主要精力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且以这个观点作为基本理论,去理解和分析各种不带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这样,就出现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直到明确提出阶级斗争为纲,迷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热衷于搞各种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乱批乱斗,乱扣帽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种“左”的政治斗争到文化大革命时发展到了极左。

“左”的思想、观点及在方针政策上的反映，可以列举很多，但是，集中起来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盲目地反“资”。这种“左”的影响很深很广，已形成了习惯，形成了思维定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我们在思想上、理论上、路线和方针政策上，纠正了“左”的错误，但是“左”的影响还存在。这种“左”的影响与改革开放，与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今天的“左”突出地反映在反对改革开放、反对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反对发展“三资”企业这些问题上。

一般都说，右倾保守，但现实生活中的“左”，也以保守的形式出现。在改革开放大潮前，他们落在广大干部群众和形势后面，僵化、保守。因此，对于当前存在的“左”的表现，不能从形式上看，不能死抠概念，而是要与过去的“左”联系起来加以剖析，弄清其来龙去脉。

右的表现主要是什么？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搞“左”的人都是在反右的口号下推行“左”的一套。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也是这样。什么右倾保守、右派、右倾机会主义，等等。所以，把右的概念搞乱了。其实，“左”反的右，常常是正确路线和主张。

在当前条件下，右主要表现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不能从本质上和原则上分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甚至赞赏和向往资本主义制度，因而对资本主义的东西不加区别地接受和吸收，最典型的是提出“全盘西化”的纲领。江泽民同志指出，右的表现主要是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动乱，企图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这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右的表现的概括。

(三)、“左”和右的根源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左”根深蒂固。过去,他还讲过,“左”的根子很深,对于我们党内的“左”,必须认真清除,而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上。

清除“左”的影响,就要分析研究“左”的根源。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着重反对了“左”,对“左”的根源作过深刻的分析。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党的文献(主要是1945年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曾经指出,“左”的阶级根源是小资产阶级。认为“左”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的反映,是小资产阶级的的思维方式的表現。这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中国的旧社会从阶级构成来说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占比重都小,而小资产阶级却如汪洋大海。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影响很大。新中国成立以后,已经过了40多年。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早已不存在了。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大多数的农民,早就成了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当然,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还存在。但是对于今天的“左”来说,情况比过去要复杂得多,不能简单地从小资产阶级方面去找根源。

江泽民同志说,“左”和右都是片面性,它们产生的根源都是主观唯心主义。

今天,清除“左”的影响,可以着重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方面,要揭露剖析“左”的错误所在及其危害和危险性,使人们对“左”有足够的认识,保持很高的警觉,另一方面,要从认识论上深入解剖“左”的思维方式。这就是要具体剖析“左”的思想、观点、主张反映出来的主观唯心主义。

“左”的思想、观点、主张,集中起来讲,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盲目地反“资”。这既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又是对资本主义的简单否定,不符合资本主义和当今世界的实际。这就是主观唯心主义。

克服“左”反映出来的主观唯心主义,不能抽象地讲哲学原理,而是要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对多一个外资就多一个资本主义的“左”倾观点,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他们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他说,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究竟怎样清除“左”的影响?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样板。就是要这样对“左”的观点作具体剖析和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决不能用扣大帽子吓人的“左”的办法来清“左”,对于大多数干部来说,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问题。

除了对一些“左”的具体观点进行深入剖析外,还要注意克服“左”的思维方式。长期的“左”倾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习惯于以抽象的原则和空想的模式来衡量现实社会主义,以姓“资”姓“社”的思维定式来思考问题,等等。这就要求加强学习,自觉地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总结。总之,要做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

(沈宝祥)

十八 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 大力推进党的建设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好如何加强党的领导的问题。今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视察的谈话中，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在于把我们党自己的内部搞好。最近，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又一次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关键是把党搞好，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努力提高党的战斗力，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大力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这是在加速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向全党提出的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

（一）在改革开放中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搞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保证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可能以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可能组织起亿万群众同心协力搞四化，不可能创造一个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不可缺少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十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党是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领导核心，党的自身状况关系到整个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要加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步伐，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领导，首先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①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战略决策。他指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着不少弊端，主要有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些弊端在我们内部事务和国际交往中已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严重阻碍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步伐，削弱了党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领导，因此，革除这些弊端，已成为加强党的领导的前提条件。十几年来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是十分正确的。

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同我们党不断地改进自身的状况分不开的。最近江泽民同志又进一步指出：“历史条件变了，社会环境变了，党肩负的任务变了，因此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方式、方法等等，也要相应地加以改变或改进。”^②这就清楚地为我们提示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一条新的思路。

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从理论上总结了我们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他指出：“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是依据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党的政治任务来决定的，必须具有一定限度的灵活性。如果环境变更，工作条件改变，党提出了新的政治任务，那末，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也必须有所改变；否则，旧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就要障碍我们党的工作内容的发展与政治任务的执行。我们党之所以是创造性的马

① 《邓小平同志论改革开放》第54页。

② 《人民日报》1992年6月15日。

克思主义的政党,就是我们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从来不受任何死的公式束缚,而且从来不把党的组织形式以至任何组织形式,看成是不可改变的死的公式,我们能够根据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具体条件和新的政治任务以及我们在组织上积累起来的新的经验,来经常改进我们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①这一段重要论述完全适用当前时期的党的建设。要着重指出的是,今天,我们党不是一般地改变了政治环境和政治任务,而是处在历史新时期、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因此,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进党的建设,而是要以改革精神来研究党的建设。

任何事物都是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变化着的事物又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着的,一成不变或固守陈规,只能窒息事物应有的活力。我们共产党人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应当不难接受这些道理。只有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党的自身状况的自我改进、自我完善,应当贯串整个现代化进程的始终。

(二)在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必须有新的建树,新的创造

我们党的建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任务,形成了我们党一整套建党理论和优良传统。这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搞好党的自身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16—317页。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和创新。这种创新的过程应包含着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般原理同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相结合,形成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二是要扬弃一些与现时代不相适应的观点和结论。抛弃那些已被实践证明不适用的经验和办法,在实践中总结出新的规律,用以指导实践,发展理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党建理论滞后于实践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理论脱离实际。只停留在党的学说的一般原理解释上,而不注重研究党的建设的新实践,至多只是在需要例子时,到现实中去撷取一二。二是固守一些老经验和老办法,而不去研究如何结合我们的形势,使这些老经验老办法真正发挥作用。更有甚者,有些人把过去在旧体制下以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下形成的一些错误做法,都当作党的优良传统抓住不放,并以此来规范实践,从而在对什么是党的领导和如何加强党的领导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一种“左”的倾向。

党的领导的方式和方法总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同党在不同时期的政治路线和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分不开的。过去战争年代,围绕着武装夺取政权,我们党形成了一套特定的领导方式和方法,以及与此相应的观念和制度。建国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党的领导方式和方法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和观念,并没有从根本上做出相应的重大改变和调整,使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带有不少战争年代根据地体制的痕迹。它明显的特点是,强调权力的集中而忽视权力的合理配置;重视党领导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职能,忽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职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实现了工作重心转移,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政治路线,这就要求党的领导体制必须适应新的历史任务的需要。邓小平同志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历史重

任的艰巨性，他郑重地告诫全党：“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已经去世的老一辈革命家，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担子已经落在我们的肩上。”^①

但是在实践中，仍有不少人在观念上和做法上都停留在框框里，因此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都会听到种种不正确的议论，例如有人认为现在强调抓经济了，党务工作的“冬天”又到了；有人提出，在企业中党委不直接抓经济工作，还谈得上什么党领导经济工作？在政企分开的改革中，有人总是用过去所理解的“党的领导”来看待“政治核心作用”，认为没有权，政治核心地位就是空的，等等。这些老观念老习惯象无形的绳索，捆住了人们的手脚，使企业的改革步履维艰。

最近，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建设在理论上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大胆地探索，力求在党的建设理论上有新的建树；在实践上同样要鼓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大胆探索，努力在思想、作风、组织建设上寻找和创造新的办法，积累新的经验。这就告诉我们，党的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面临着一个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大胆创新的重大任务。这一任务的提出将进一步把我们党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推向前进。

当然，大胆探索和大胆创新绝不是要否定党的传统经验和做法，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运用老经验、老办法，使之具有时代的新内容。不过，既然是探索，是创新，就要勇于冲破种种旧的观念和过时的方法，这就要有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敢于创新的勇气，还要善于区分哪些是正确的观念，哪些是以革命的面貌出现的错误的观念，站

^① 《邓小平同志论改革开放》第55页。

在党性的立场上，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勇于改革，勇于创新，才能使我们党振奋精神、昂扬斗志，更好地承担起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历史重任。

(三)按照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大力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

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来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建设以保证政治路线的实现为总要求。这是我们党的建设的又一条基本经验。在历史新时期，我们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建设应当按照基本路线的要求，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特别是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展开。不少党委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好经验，创造了许多好方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一讲加强党的领导，有些人就立即把过去那一套捡起来，甚至轻车熟路地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时的老路上去。前一时期，针对自由化泛滥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我们党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有些人便立即把一些在改革实践中已证明过时的做法捡起来，甚至还有人提出要把反对和平演变作为中心任务来抓。另一方面，一讲改善党的领导，有人又错误地认为，这意味着要弱化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这种状况，反映了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一问题缺乏一个基本的指导性认识。

学习邓小平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党的建设方面的论述，特别是今年年初南巡谈话的精神，不难看到，邓小平同志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一问题上的一条基本的思路，就是要围绕着实现党在现阶段的中心工作的需要来改进党的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这一条就容易判定哪些观念和

做法是需要破除的,哪些新出现的观念和做法是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的。这无疑是一个总的思路、总的原则。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又一次明确提出了这一总思路、总原则。他说:“党肩负的任务变了,因此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方式、方法等等,也要相应地加以改变或改进。”^①接着他又从几个主要的方面阐述了如何进一步改进党的工作,其中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总的思路、总的原则,对我们在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中大力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江泽民同志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衡量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标准是什么?过去战争年代有它特定的标准,现在情况不同了,处于和平建设时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应有新的衡量标准。党员应是诚心为人民服务,立志改革开放,献身现代化事业,带领群众不断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做出实绩的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干部如何以身作则,正确对待个人利益呢?战争时期我们提出过一个口号,叫做“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建国后,五、六十年代,我们党又提出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口号。在今天,我们虽不主张党员当苦行僧,但绝不允许把个人利益和个人享受看得高于一切,先于一切。应当提出一个反映这一基本要求的新口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必须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学习要精,要能学以致用。除此之外,还要学习经济学知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不具备这些知识,党的中心任务就难以完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和战斗力,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整个战斗力的基础。党的基层组织

^① 《人民日报》1992年6月15日。

的状况,关系到党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领导状况。与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的要求相比,党的基层组织不大抓不行了,不大力加强不行了。这种紧迫性是加速经济发展、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客观要求的反映。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

总之,随着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都面临着一个如何进一步改进的问题,党的领导面临着一个怎样领导和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我们只能在发展经济、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际,大胆地探索和大胆地创新,及时总结新经验、新办法,用于指导实践。综上所述,依据党在现阶段的中心任务的需要,革除那些不相适应的观念和做法,在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大胆地探索新经验,新办法,从而使党的领导的方式和方法在不断改善中得到加强,使党的各方面建设在不断改善中得到加强。这是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刘荣荣)

十九 在新形势下干部要加强学习

现在,全国各地各部门都在为贯彻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和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提出的任务,积极努力工作。我国的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现了新局面,形势发展很快。在这样飞速发展的形势下,要取得工作的主动权,提高我们干部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提高我们干部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增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加强学习是很重要的。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干部要加强学习的要求。这是有很大针对性、紧迫性的课题。

回顾历史,我们的党历来十分重视学习。我们这样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要解决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问题,就必须不断地学习。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过,“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①特别是在革命和建设的重大转折关头,学习尤为重要。当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页。

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①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即初步总结“左”的“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联系历史经验，又一次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提出：“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②在建国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又一次极其鲜明地提出了学习问题。他说：“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③重视学习，努力学习，是我们党的一个很好的传统；认真学习，刻苦学习，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的神圣义务；勤奋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否创造性做好工作的一个基本条件。

正是从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样的历史高度着眼，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把加强干部学习作为加强党的建设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的一个重大课题提了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0、1481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9页。

③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43页。

来。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不仅从要把经济搞上去,要使社会主义中国在上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历史重任的高度,提出加强学习的问题,不仅从我们不懂得、不熟悉、不精通的东西还很多,或者过去懂得的、熟悉的东西,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知识的迅速更新,又变成不懂得、不熟悉,这样的现实紧迫性,提出加强学习的问题;而且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出发,提出为了做到日新月异,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应着重加强学习的内容。江泽民同志强调,要挤时间,主要抓好三个方面的学习:

(一)要加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结晶。我们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干社会主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干部首先要学习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求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①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希望党中央能做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时间学习,熟悉马克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27页。

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后,党中央发出了文件,具体明确地规定了各级领导干部进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学习理论的制度和办法。今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时又一次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的真理颠扑不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失败,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不灵了,恰恰是因为他们的实践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这个历史教训又一次提醒我们,要紧密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努力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邓小平同志集中全党的智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丰富经验,提出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规划了我们从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前进的科学轨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依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而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及一系列方针政策,已经经受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多年实践的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同三中全会以前一个较长阶段状况的对比,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并有了新的发展,这样的事实证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引导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标志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实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的飞跃。

我们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完全是为了应用,学马列就要精、要

管用。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全党全国人民统一认识、增强团结的思想基础，是警惕右、防止“左”的锐利思想武器，是指引我们深入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地更快更好发展的伟大旗帜。我们的干部一定要认真注意掌握这个理论的基本思想，学习掌握邓小平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战略思想、理论观点和决策原则，而且要努力学习他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的革命胆略、远见卓识、勇于创新的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改进我们的领导工作，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

(二)要加强对经济学知识和经济工作实践经验的学习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掌握较多的经济学知识。对于搞经济工作的干部来说，理所当然地应当学习经济知识，即使其他工作部门的干部，也应当学一点经济。我们的一切工作要自觉地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如果对经济不了解，尽管主观上希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结果仍做不出应有的贡献，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甚至还起相反的作用。各行各业的干部只有学习和掌握必要的经济知识，才能在围绕和服务于经济建设方面自觉地发挥作用。

学习经济学知识，首先应当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详尽的全方位的系统剖析，不仅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而且从

根本上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运行的基本规律。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指导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是十分重要的。这里,应当指出,一段时间里,我们在一些经济理论问题方面,比如计划和市场等问题上争论不休,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很好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著作。一些同志只读了某些教科书中“资本主义无计划”的论断,而不了解或不注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有过的论述(比如恩格斯在 1891 年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时曾说过,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出现,标志着生产的“无计划性没有了”;比如列宁在 1917 年也讲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资本主义,“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等等);也不愿去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 50 年代以来,不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注意对经济活动进行计划调控的现实,这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说明现代经济的活动。所以,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很现实的课题。

学习经济学知识,还应当注意研究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到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我们应当看到这些理论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本质,决不能把这种研究变成对资本主义的盲目崇拜,从而丧失社会主义自信心;同时又应当看到这些理论毕竟从许多侧面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运行中的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趋向,反映出了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规律的要求和具体运行规则,尤其是关于经济管理和提高经济效益的论述,关于数量分析和技术经济的论述,关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论述,关于租赁、股市、证券、期货等等的论述,都有我们可以借鉴和利用的有益东西。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高于资本主义,既包括批判和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解决的矛盾,也包括借鉴、利用资本主义条件下为人类文明贡献的成果,其中就包括西

方经济学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反映的文明成果。因此,研究西方经济学,是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对西方经济学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抱着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是一种幼稚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我们要好好学习经济理论,也要重视对经济工作实践经验的学习。现在,从全国范围来看,已经出现了若干个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和先进典型。我们应当认真学习这些经验,领会这些经验中的本质性的东西,把它们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以推进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工作。还应当看到,本地区和本部门也有一些好的经验,也应当认真总结研究。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探索中不断地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经验,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和学习。当然,所有经验都是同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相联系的。拒绝学习是不对的,采取囫圇吞枣的态度也是不对的,要结合自己的具体实际来思考,来学习借鉴。

(三)要加强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

文化知识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一切专业知识的基础。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毛泽东同志亲自为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等同志编写的《文化课本》写了一篇序,这是一本为文化知识较低的干部编写的课本。毛泽东同志在序言中写道: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这番话,对我们今天仍很有启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贯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我们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同担负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任的干部职责相比,即使学历比较高的同志甚至在某些方面有些造诣的同志,也仍有一个补充知识的问题,比如受过理工农医之类高等教育的同志,有一个学习补充社会科学知识的问题;受过文史哲经之类高等教育的同志,则有一个学习补充自然科学知识的问题。不论哪一类干部都有一个学习补充领导科学、决策科学等知识的问题。特别在新的技术革命、知识更新周期日趋缩短的形势下,不断地补充新知识,尽可能地博览群书,特别重视与自己专业工作相关的科学文化知识,更为必要。我们每一个同志都应当看到形势发展要求自己现状的差距,看到自己的不足,把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列入我们所有干部的学习日程。

加强干部学习,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是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干部水平的一件大事,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来认真对待,积极寻找多种途径来有效地搞好这项工作。党校、干校是我们党培养干部、组织干部学习的重要阵地。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是我们党的重要阵地,既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也是交流党的工作经验的阵地,更是培训党的干部的重要阵地。所以一定要把它们办好,而且要越办越好。不重视党校工作,认为党校可办可不办,进党校学习可去可不去的思想,都是要不得的,不正确的。江泽民同志希望党校在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再接再厉,为我们党的事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领导人才。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对党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关于加强干部学习的要求,关于干部学习之前应着重抓好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应当在党校、干校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中有所体现,并应积极探索和积累

经验。

干部学习除了进学校之外，主要靠干部在工作中挤时间学习。现在大家都在力争加快步伐，时间很紧张，机遇要随时抓住。这就更加要求干部提高自觉性，特别是要解决好“白天下会海、晚上爬文山”的问题。而且要克服形式主义的东西。理论和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没有几年苦功夫，没有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不会收到成效的。而坚持下去，必有好处。我们要提倡周恩来同志那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我们的干部能切切实实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知识、文化知识方面学一些东西，力争多学一些，学好一些，我们的工作就一定会有新的进步。

（王兆铮）

二十 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 重要谈话精神的要求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既精辟地阐述了邓小平同志今年重要谈话的精神，回答了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且对全面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谈话精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传达以后，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是非常重视的，正在努力贯彻落实，形势很好。现在在各级党委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进一步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成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江泽民同志强调，贯彻落实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和组织实施中央的各项工作部署，一定要同本地的实际结合起来，并使之具体化。要真抓实干，少说空话，多办实事，鼓实劲，出实效。

要把这些要求落到实处，见到成效，我们的同志尤其需要从这样一些方面来加以努力：

（一）要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风貌

邓小平同志今年的重要谈话传达以后，广大干部和群众欢欣鼓舞、信心倍增。他的谈话以鲜明的针对性，把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问题指明了，把党内值得注意和应防止的问题及思想倾向讲清楚了，把大家心里想说的一些话说出来了，把有些原先思

想上不太明确的问题说明白了,因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十分珍惜和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的干部要站在群众的前列,带领群众,指导群众,组织群众,务必使群众积极性得到很好的发挥。这里,首先要解决好干部的精神状态问题。

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谈话,是解放思想的谈话。十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首先解放思想。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的号召,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几年不断地解放思想,就不会有今天我们取得的一系列的成就。解放思想,首先要求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解放思想。

现在,对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同心同德地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上下是齐心的。但是,如果不解放思想,还是迈不开大步。因为,归根到底,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项伟大的探索性的事业,正如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中指出的那样: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在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谈话精神过程中,困难问题是不会少的,我们走的是前人未走过的路,没有一种敢想敢干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风貌,过于谨慎,片面求稳,等靠要,那就会坐失良机。80年代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过,“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解决”,“脑子总要想些主意”。^①没有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9页。

这样动脑筋想主意的精神状态，事事墨守成规，我们的事业就没有希望。

要动脑筋想主意就要突破框框，要突破各种各样的“左”的框框。这里，要着重提一下，打破怕犯错误的思想状态的问题。任何开创性的事业，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有些差错误是难免的。邓小平同志一再讲，“今后我们可能还会犯错误。但是，第一不能犯大错误，第二一发现问题不对就赶快改”。^①这就是说，我们的解放思想不是无根据地胡乱闯，而是象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中要求的那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放思想就是尊重实事求是，就是要冲破一切阻挠实事求是的条条框框，就是按事物的客观规律办事。实事求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总是向着真理方向迈进。

（二）要进一步认真分析研究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把邓小平同志谈话精神、中央和上级的部署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这些年来，一些搞得好的地区和部门，无例外地有这样一条深刻的体会，那就是做好“结合”这篇大文章，而要结合，最要紧的就是对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要吃透。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② 我们的许多同志都是注重调查研究的，有些同志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工作时间很长，谈起具体情况如数家珍，但是并不等于就把实际吃透了，我们不仅要看到本地区、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18页。

本部门,而且要在同外地区、外部门联系对照中去把握;不仅要看到本地区、本部门的有利因素不利因素,而且要从转化及相互影响中去把握事物,这就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调查研究,并且对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进行全面的辩证的分析,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时代赋予我们的机遇和面临的严峻挑战,才能在“结合”上作出准确的判断。

搞好“结合”,也要有实事求是的勇气。“结合”就不是照搬,就是要走自己的路。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风言风语,也会有指责非难,尤其是当某些改革行动出现了一些差错或较大的负效应的时候,那就更会迭起风波。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呼吁社会为改革者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我们的领导机关也应为下级干部的改革行动给予支持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干部,我们立志改革的人,我们立志为祖国富强振兴而有所作为的人,应当有点冒风险的精神,应当自强自尊自信。毛泽东同志1957年谈到改革时曾强调过:“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①应当在全社会,在我们的干部中,尤其在领导干部中,提倡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风气。在当前,尤其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贯彻邓小平同志谈话和中央的部署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怕这怕那就不怕违反实事求是这个基本原则,那恰恰是最大的错误,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民的利益。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2页。

（三）要发扬务实真干、周到细密的作风，在出实效上下功夫、花力气

我们既要看到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们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经济发展，有许多有利的条件，良好的机遇，绝不要放过这种有利时机；又要认识到把握和运用这种机遇，还需要我们做大量的艰苦的工作。把机遇看成是可以坐享其成，而不是当作需要跳一跳才能摘到的果实，那是一种懒汉的哲学，也是注定不能实现的。为了把握机遇，我们必须大大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提倡切切实实地做工作的劲头，既反对坐靠等，更反对搞花架子，搞害人害己的形式主义。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告诫我们，要认清我们的担子重、责任大、要埋头苦干。这对于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谈话精神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在实干苦干上做文章，费心思。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批评了形式主义多的问题。他严肃地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应当看到，形式主义也是一种顽症，多年来成为一种习惯势力，成为惯用的工作方法，乃至构成某种思维定式。这种情况，在贯彻落实小平同志谈话精神的过程中，也不能说是绝迹了。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在一些地方、一些时候、一些工作领域中，形式主义仍然故我，甚至还有新花样出来。因此，一定要把务实真干同形式主义尖锐地对立起来。

应当指出，形式主义之不断沉渣泛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某些干部的一种不健康的思想作风和心态。这是极为有害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改革开放面临的新课题，无论有多么艰难，我们都要认真地对待，实实在在地动手去解决，决不能采取绕过去的回避态度。而这就需要我們下功夫，花

力气，动脑筋，踏实干。当然，讲埋头苦干，决不是不动脑筋地蛮干，决不是不顾条件地乱上，而是要开动脑筋，放手去干。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伟大的系统工程，要求各行各业有机有序地协调配合，改革进入攻关阶段，更要求各个方面的共同协调行动。这就要求我们把埋头苦干同周到细密紧密地结合起来。这里，重要的是要树立并确立尊重客观规律的观念。我们的干部在各自的地区和部门的工作中，要放开眼界，不仅想到本地区、本部门，而且考虑到与外地区、外部门的联系；在采取改革和发展的某项措施时，不仅要考虑其必然的正效应，而且想到可能产生的负效应，不仅要对本项工作有周密地安排，而且要考虑到配套措施是否相应得当。我们做工作应当是积极进取的，又是留有余地的。

（四）及时总结经验，不断地了解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是十多年来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贯思想的高度体现和新的发展，同十几年来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各种重要理论观点和实际决策一样，都同现实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都是对生机勃勃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他指出，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邓小平同志

的谈话之所以极大地鼓舞了群众，极其重要的一条就是本质地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

现在要把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精神落到实处，也必须十分重视群众实践经验的总结，尤其是新鲜经验的总结。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就要求：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我们应当始终清醒地把握住这一点。

总结经验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特别要警惕“左”的框框的束缚，应当从根本上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里，特别需要对群众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新经验采取科学的全面的辩证分析的态度。群众中孕育着很大的社会主义创造性，我们既不可用自己已有的认识去束缚群众的实践，亦不可以对群众中创造的经验不作加工分析。列宁说得很对：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管’这些嫩弱的幼芽。对于群众创造的经验要作深入地研究，要看到这些经验的本质，扶植其健康地成长，同时又要如实地看到这些经验中的局限、不足乃至不当的一些方面，进而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的措施，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还必须提到对某些实践中不成功的经验教训的态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因此，也不应放松研究，要从中引出教训来，切切不可放过去。

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和组织实施中央的各项工作部署，既是人心所向，又需要付出艰苦劳动。我们既要有历史紧迫感，又要脚踏实地地努力工作。只要全党全国上上下下同心同德，我们的改革开放步伐一定会加快，我们的经济发展也会出现一个新局面。

(王兆铮)

封面设计：姜保玲

ISBN7—5017—1861—

X/D · 161 定价：3.55 元